吴江县志人物篇

吴江英烈

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吴　江　县　民　政　局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　　编：钱士坤　谢阿金

副 主 编：王卫平　徐佑永　徐惠琴

编　　辑：吴致和　金　丽　朱金良

沈建国　沈坤荣　吴蓉华

向士賢

致敬陸

筆列

定二

一九八〇年八月

振衣千仞岡
濯足萬里流
日月光天德
乾坤一草亭



张应春烈士雕像



张应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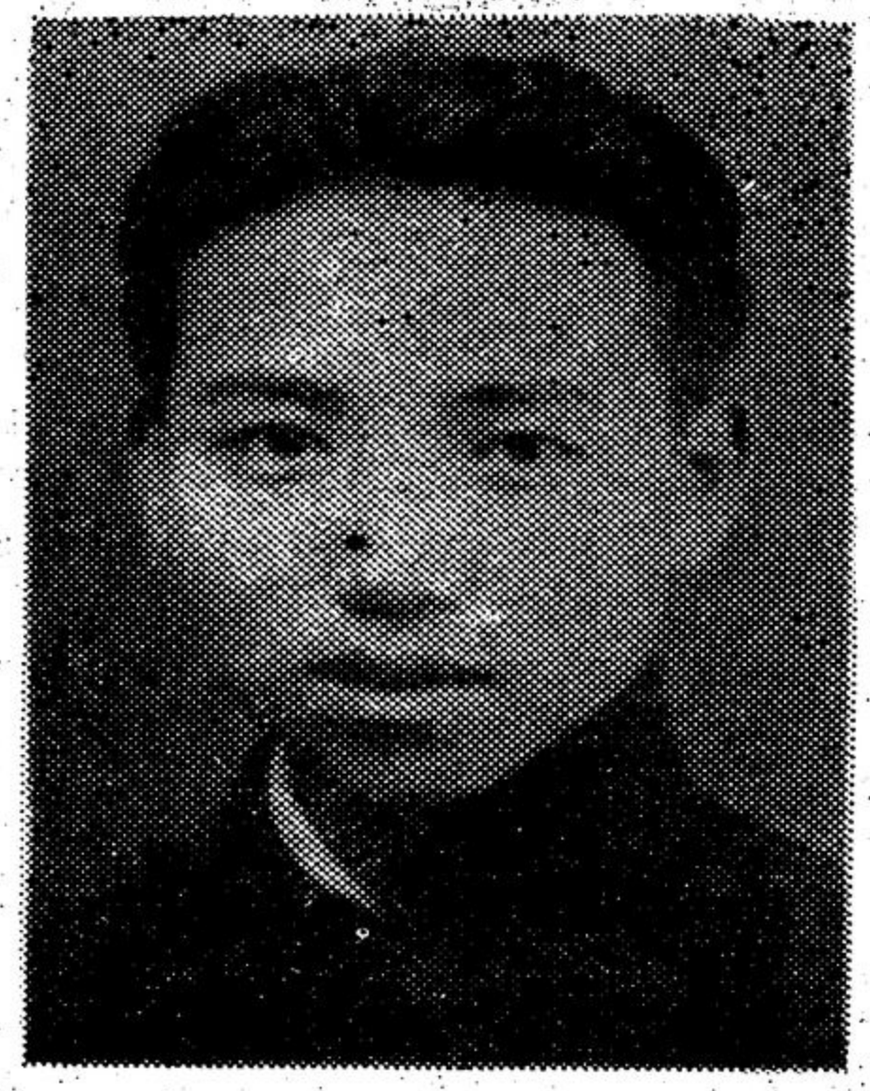
孙世实



倪淑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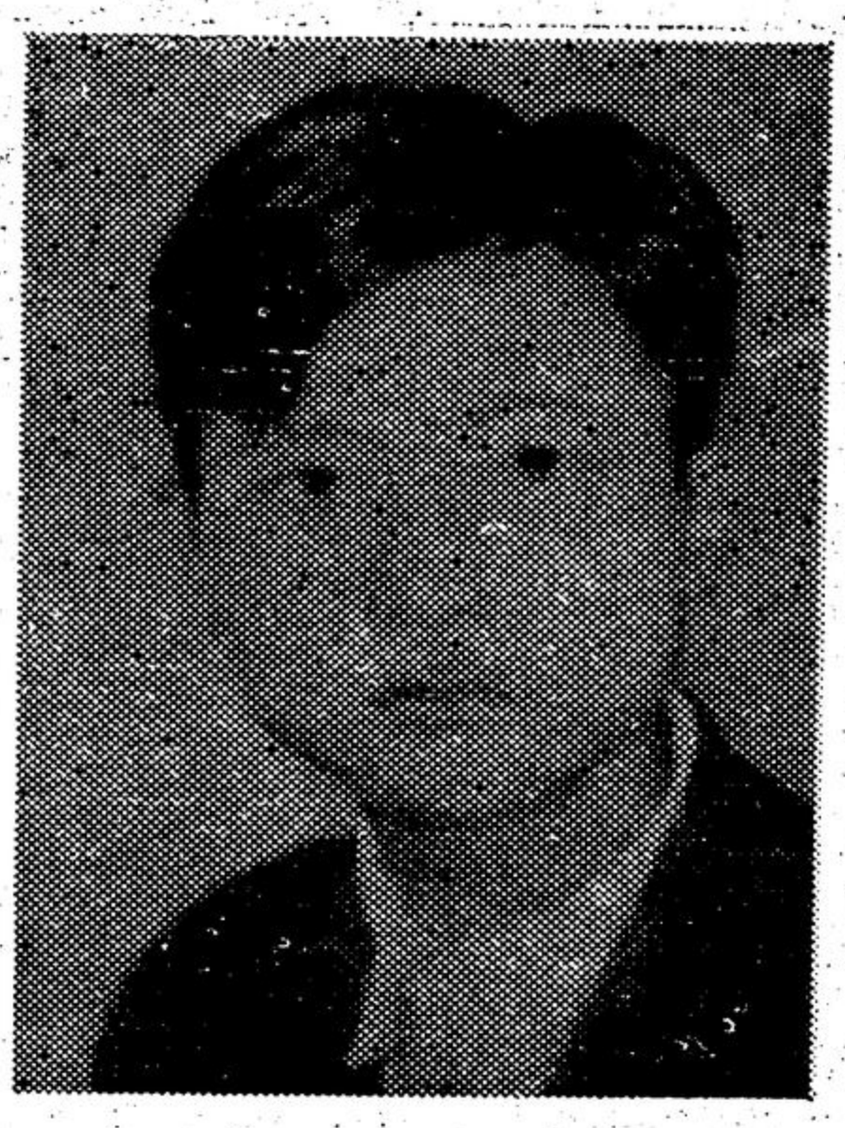
钱康民



沈文潮



虞仞千



俞清志



顾葆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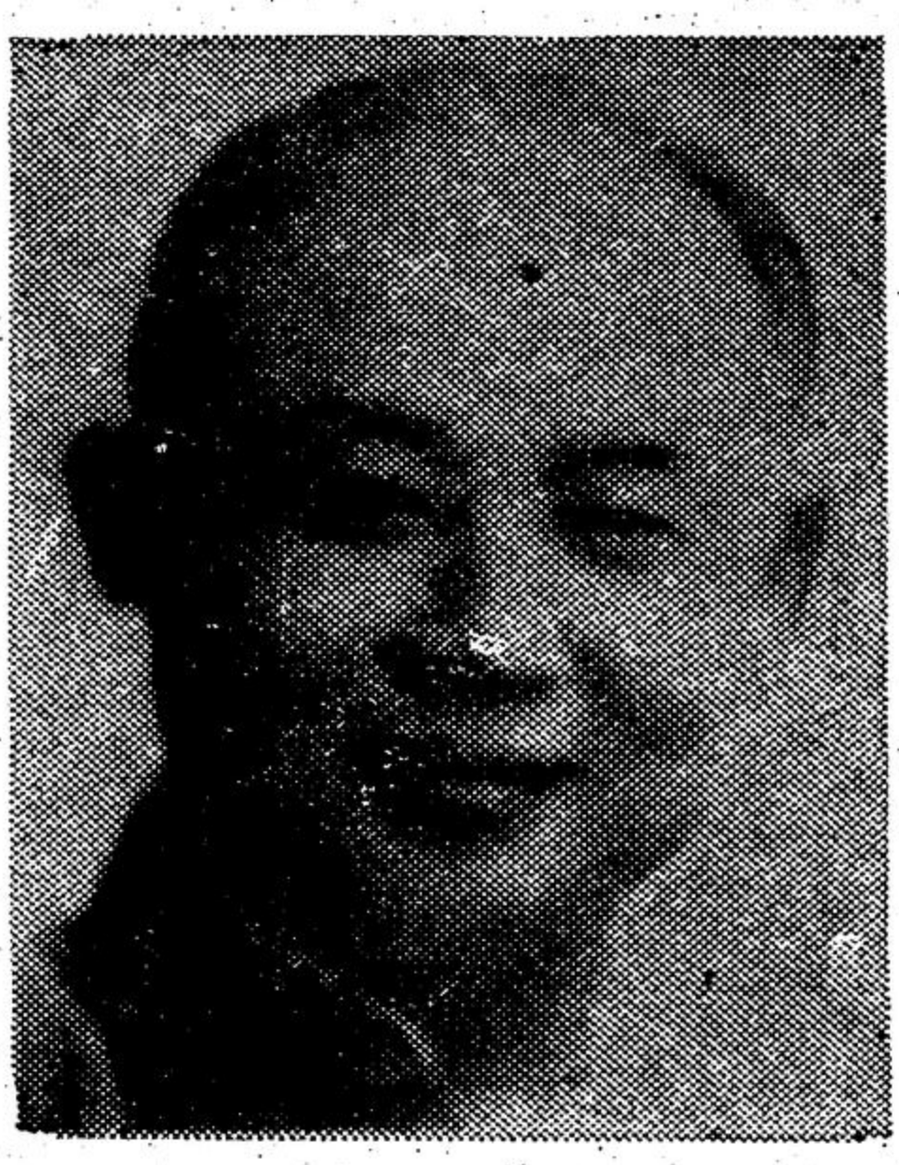
张梓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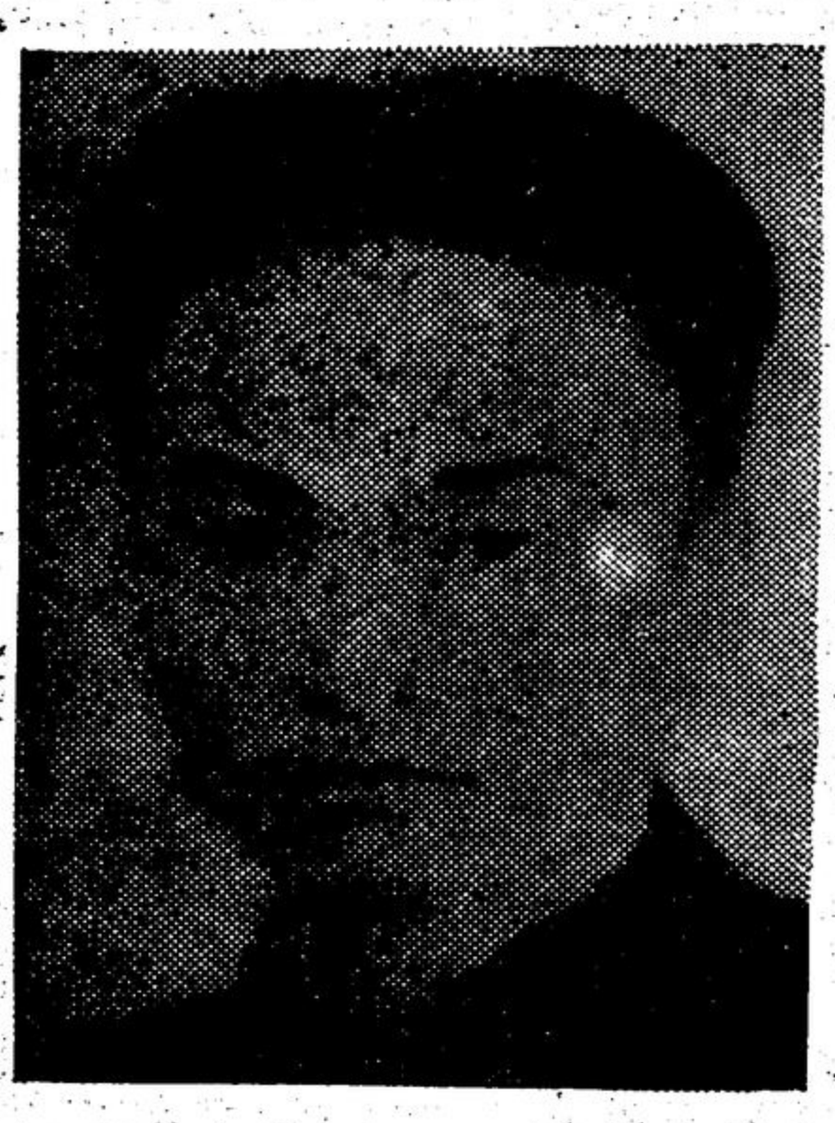
姚之英



陈有民



费　巩



顾关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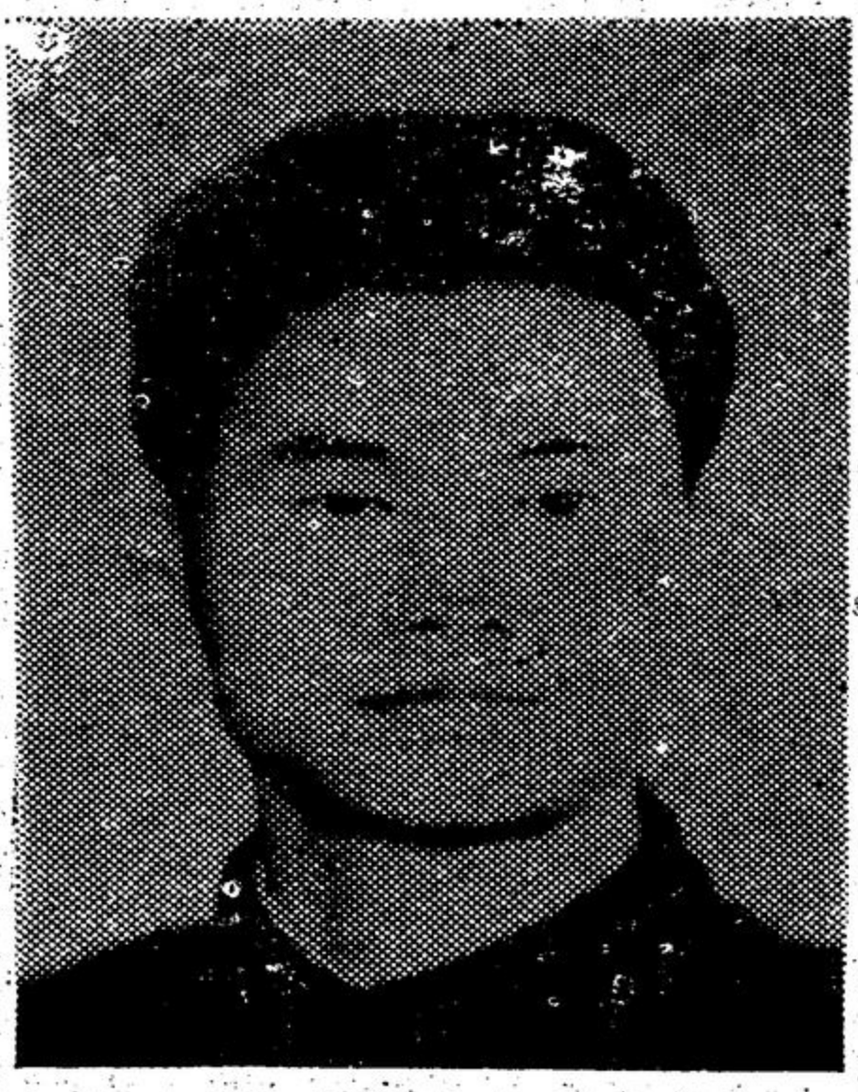
沈　波



寿　鸿



潘天扬



陈耀庭



程　强



丁秉成烈士墓



吴毓弢烈士墓

吴江县志人物篇

吴江英烈

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吴　江　县　民　政　局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　　编：钱士坤　谢阿金
副 主 编：王卫平　徐佑永　徐惠琴
编　　辑：吴致和　金　丽　朱金良
　　沈建国　沈坤荣　吴蓉华

士向

費肇凡致敬

陸定一

一九八〇年八月

烈

目　录

序言 …… 钱　明(1)
张应春(1901–1927) …… (1)
孙世实(1918–1938) …… (20)
丁秉成(1908–1939) …… (50)
钱康民(1907–1939) …… (54)
沈文潮(1915–1941) …… (60)
虞仞千(1921–1941) …… (62)
王化鹏(1916–1941) …… (65)
陈有民(1922–1941) …… (70)
顾葆恒(1916–1942) …… (72)
俞清志(1917–1943) …… (75)
倪淑英(1916–1943) …… (81)
张梓楠(1916–1944) …… (86)
姚之英(1921–1944) …… (88)
费　巩(1905–1945) …… (92)
顾关通(1923–1945) …… (112)
沈　波(1925–1947) …… (119)
寿　鸿(1918–1948) …… (124)
潘天扬(1918–1949) …… (127)

吴义琛(1914—1949) …… (132)
吴毓驿(1925—1950) …… (134)
陈耀庭(1932—1970) …… (139)
吴江革命烈士英名录 …… (153)
后记 …… (176)

序　言

吴江县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优秀吴江儿女，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幸福，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其高风亮节，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英名永垂青史，光辉永照人间。

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江县民政局联合编写《吴江英烈》一书，于纪念先烈、教育来者，于推进两个文明建设，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革命英烈永远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光辉榜样，是吴江人民的骄傲和学习的楷模。吴江英烈的思想情操和光辉事迹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和有关部门，都要认真组织党团员、青少年和人民群众阅读好这本书，以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珍惜革命成果，促进我县两个文明建设。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经受着更严峻的考验。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吴江英烈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中共吴江县委副书记　**钱　明**

张 应 春

张应春（1901—1927），女，1901 年 11 月 11 日（农历十月初一）生于吴江县黎里区葫芦兜村（今北厍镇黎星村），字蓉城，应农谚“十月应小春”之说而取名应春，后因仰慕秋瑾女侠为人，又自号秋石。

应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张鼎斋（又名肇甲、都金）是一位博学乡儒，曾任黎里女校教师，加入过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母亲姓金，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因一连生下 4 个女孩，倍受歧视，以致精神几乎失常，这使应春从小仇恨封建礼教，萌发争女权的强烈愿望。

张应春少年时就读于黎里女子高小。她从小疾恶如仇，敢说敢为。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年号为“洪宪”，校方下令学生在写课堂日志时，将“民国”改为“洪宪”，应春十分气愤，大骂袁贼倒行逆施，坚决不从。她的反抗精神深得同学钦佩。

应春勤奋好学，各科成绩均佳，数学尤为出

众。她平时生活朴素，关心同学，柳亚子的小妹柳均权是应春的同窗好友，在教室内，两人的课桌平列而置，放学回家结伴而行，十分亲密。应春多次对均权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乃封建意识，我辈要勤奋学习，要争女权，要以天下为己任。令兄亚子为何与你姐妹三人取名‘平权’、‘公权’、‘均权’？你该顾名思义!”

1919 年，张应春高小毕业，随即考入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三年读书期间，她关心时局，经常在日记中表达对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痛恨，和对国家兴旺、人民自由的渴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想到国家前途甚至危险，美、英、法、日四国能同盟协约……恐怕就是瓜分我国的基础。我想到这一层，更加惊骇得不得了，心中不觉叭一跳，好象开汽车一般。”她每当度假时，总要带着妹妹走访农家，和乡亲们谈心，询问收成好坏和生活情况，关心农民疾苦。她说:“农民终年辛勤耕作，却不得温饱，太不公平。”



张应春在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到福建厦门集美女子师范担任体育教员一年。暑假，应春因小腿患丹毒而回家乡医治。一路上，耳闻目睹人民疾苦，到家后，她与同学和乡亲交谈中，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鼓励大

家。

在这段时间里，经柳均权介绍，张应春与柳亚子先生结识往来，十分投机，成了亚子先生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学生和战友。1923 年秋，张应春经柳亚子介绍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任教。在松江，她先后结识了中共党员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等。张应春在这个环境中深受教育和熏陶，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她由侯绍裘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张应春投身革命后，为了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女权，毅然带头剪去发髻。在二十年代的旧中国，女子剪发还极为罕见。她父亲知道后，严词责备。应春说:“大人苟终弗儿谅者，儿且远走北国，终身不复宁家矣!”表现了她一往直前的坚决态度。

1925 年春，张应春离开景贤女中，回到吴江县家乡。她的齐耳短发，在故乡遭到某些人的非议，有的小孩跟在背后叫她“盛泽尼姑”，但她意志坚强不为所动。在张应春的竭力倡导下，黎里镇创办了一所暑期妇女学校，应春被公推为主任教师，负责教务工作。同期，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黎里镇召开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张应春与柳亚子、江苏省党部代表侯绍裘（中共党团书记）一起登台，发表演说。她慷慨激昂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心

协力，国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抛弃三大政策，就意味着背叛了三民主义。”号召大家时刻记住和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她雄辩的讲话受到听众热烈的赞许。会后，应春手捧孙中山先生遗像，和柳亚子、侯绍裘等一起带队上街游行。

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张应春当选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革命呈现出一派蓬勃气象。但是，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反动面目日益暴露。1925年9月的一天，沈玄庐（又名沈定一，上海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后堕落为西山会议派骨干）闯到江苏省国民党党部，指责省党部进行赤化宣传，诬蔑共产党抢席位，抢占省党部各级委员会名额。应春义正辞严地予以反驳：“在革命困难的时候，你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革命形势好转了，就想来坐享其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提出的，你想反对，难道你比孙先生还高明吗？”驳得沈玄庐理屈词穷，灰溜溜地离去了。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工作开展十分艰难。张应春常常通宵达旦，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工作之中。在国民党右派下令解散妇女运动委员会后，应春针锋相对，与中共党员杨之华等日夜奔波，另行

组建了妇运会。

在斗争实践中，张应春深切地体会到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她挤出时间到中共早期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上海大学听课。张应春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识不断提高。1925 年 10 月，由侯绍裘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 11 月 17 日写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说:“我认为入了党（指中国共产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孙先生遗给我们的使命吧？”表达了她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精神境界。

1925 年 12 月，国民党右派把庆祝东江胜利为主题的妇女集会改为各界妇女联欢会，张应春对此十分不满，拒绝参加大会以示反抗。她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接连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并就妇女工作的经费、妇女部长人选、及注重劳动妇女工作等问题，与柳亚子进行磋商。

1926 年 1 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应春作为江苏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会上，她提出了关于妇女运动的两项议案。回沪后，应春又参加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召开的市县干部联席会议和干部训练班，与各县干部广泛接触交谈。她每天工作很忙，经常和妇女部秘书史冰

磕等彻夜讨论问题，第二天一早又投入新的工作。

为了指导妇女运动，扩大革命宣传，张应春决定创办一个妇女界的刊物，名曰《吴江妇女》。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吴江妇女》于1926年3月8日妇女节的那天在上海创刊，张应春为主编。刊物的宗旨是：号召妇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以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应春在创刊号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说："我们吴江的妇女……要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得种种的平等"、"向压迫阶级进攻"。《吴江妇女》在当时只能秘密出版发行，应春冒着生命危险，忘我工作，承担了组稿、撰稿、编辑发行、筹划经费的全部工作。《吴江妇女》虽然仅出版了5期，但它对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和指导作用。

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在南京举行。张应春与柳亚子、侯绍裘等人先后从上海赶到南京。那天上午，在南京夫子庙贡院召开的大会上，应春发表了演讲。会后，举行群众游行，她手执"拥护国民会议"的旗帜，走在女工队伍的最前头。下午，在中山陵墓破土奠基时，国民党右派雇用一批打手冲击会场，向柳亚子等左派领导

人大打出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张应春等女同志挺身而出，奋力护卫，使柳亚子等安全脱险。

同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到段祺瑞政府请愿，刘和珍等爱国青年学生惨遭枪杀，酿成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张应春怒不可遏，亲自执笔撰写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指出:“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我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奋斗吧！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她还在《悼北京为爱国惨死的女烈士》一文中写道:“烈士们！姐妹们！你们可以算死得其所了。……你们的流血是群众的。”“北京女烈士的惨死，在意义上可以和德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卢森堡的被害相提并论。”张应春日夜奔走，四出演讲，每天只是随便吞几口冷饭充饥。一次，她被密探跟踪，就机警地避入贝勒路恒庆里柳亚子的住处，摆脱了敌人的盯梢。

1927年3月，罗亦农、周恩来几次提议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南京，以加强中共对革命的领导。侯绍裘率省党部成员于4月2日抵达南京。因积劳成疾，正在吴江家里治病休养的张应春接到裘一连三封急电，便不顾家人劝阻，于4月7日毅然离家赴宁。此时张应春已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

委员会委员、中国济难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党外仍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

4月9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中共南京地委召开各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举行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10日上午9时，四五万群众举行集会，侯绍裘愤怒谴责蒋介石嗾使数百名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拘捕工会、党部负责人的反动罪行，要求释放被捕同志，惩办凶手。大会组织群众到总司令部请愿，不料，又遭敌人的血腥镇压，当场有数十群众被打死，受伤者数以百计。当晚11时，中共南京地委会同国民党省市党部、总工会的中共负责同志，在南京大纱帽巷10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和对策。11日凌晨2时，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南京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虎臣带领便衣特务50余人突然包围了会场，侯绍裘、张应春、刘重民、谢文锦、许金元、陈君起等10人同时被捕。

在狱中，张应春英勇顽强，坚持斗争。敌人严刑逼供，将她吊打一天一夜，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可她只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一句话，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凶恶的敌人恼羞成怒，最后将张应春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活戳死后，连夜秘密抛入通济门外九龙桥

下的秦淮河中。应春牺牲时年仅26岁。

1928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国，四处寻找应春烈士遗骸未得。悲愤之余，请画家绘制《秣陵悲秋图》，并征集题咏，以寄哀思。柳亚子诗云：

“血花红染好胭脂，
英绝眉痕入梦时。
挥手人天成永诀，
可怜南八是男儿。”

1931年，柳亚子等南社友好在张应春的故乡北厍黎星葫芦兜村的北莲荡滩无多庵西处建造烈士衣冠冢，于右任题“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于墓前。

1987年，吴江县人民政府为张应春烈士墓重新镌了一块纪念碑，并于墓园旁新建了烈士纪念室。

1991年11月，在张应春烈士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吴江县委、吴江县人民政府在吴江公园尊立张应春烈士雕像。张爱萍将军为雕像题字：“张应春烈士永垂不朽！”

（徐佑永整理）

附一：

张应春给柳亚子先生的信

(1926 年)

亚子先生：

前上一信谅已收到。大会情形详观日刊罢。我已向发刊处签名，请他们直接寄您二百份，够么？我想许多人，他们中国国民多没时间来看，则日刊更无论矣。故暂时二百份恐够分配了罢。大会这几天多是报告，没有提案讨论哩!

我做了二个提案：（一）中央各省党部组织妇女运动讲习所函授班案；（二）中央各省各县党部附设平民妇女学校案。别的所要想提的都被广东已提出了，我们不必再提，以后开议时附议好了，您道对么？

今天中央妇女部何部长[1]说，要我们各省妇女部做书面的报告。我觉得万分惭愧，因为实在没什么成绩可以报告，只得勉强做一些，已请绍裘删改。我的议案也是请朱侯两先生看过的[2]。在此我觉得我的能力实在薄弱，学问实在不够，明年想进上海大学新社会系求学，不知做得到么？你在同志的地位来切实地评论一句好么？我所以要读书原因如下：（1）想得些知识上的进步而领导妇女们做革命工作；（2）我的脚至今未痊 ，教员当然不能做了；（3）我现在

住在上海，省部方面党证仍由长林发或由省部交给我，妇女部事情仍旧可以顾到，你看如何？

何香凝同志见识实在不错，她在五日那天公祭廖先生时发表的意见和祭沙基惨死烈士时的报告都令人发指③而钦佩。我想要和她详细谈话一次调查妇女运动，但我的计划尚未做好，故不能即日要求，况且这几天她很忙罢。大会至早十五号闭幕。现在一个问题也没讨论过，时间已过了七天了，您道糟糕不糟糕呢！

吴江方面党部进行如何？代表会结果谅很好，楚女、长林宣传得结果如何？请告我听听。

这次选举，您和季恂恐怕多（都）要举到罢，您想来允许罢。但是省部方面受应（影）响了，而且我们要迁南京（在船上和重民等谈起而已）绍裘又不便了，您道怎样？

我们开完大会后经费能够争到。我们大家说就要开省代表大会了，您的意见如何余后告，再会。

祝您努力！

应春上　　十五年一月七日夜十一时

注释：

①何部长：即何香凝（1878—1972），国民党革命派杰出代表。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先生的夫人。1904 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致力于推翻清朝的斗争。民国以后，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护法运动。1924 年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任国民党执行委员和妇女部

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坚决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皖南事变后发表宣言，严斥蒋介石策动内战的阴谋。1947年与李济深等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

②朱侯两先生指朱季恂、侯绍裘。

③这里是说报告所揭露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烈士的罪行令人发指。

附二:

忆大姐应春烈士

大姐应春牺牲时年仅26岁，当时我虽年纪尚小，但至今大姐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在她生前与柳亚子、姜长林等同志的通信中，在她生前所写的日记里，在《吴江妇女》上发表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所表现的对党的忠诚，和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岁月流逝，但烈士浩气长存。

大姐应春烈士生于1901年11月11日，时值农历十月初一，以"十月应小春"谚语而取应春。父亲张都金为黎里女子高小的语文教师，最喜欢大姐。母亲姓金，是一位慈祥的女性，一连生下四个女孩。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家里人认为是多余的，要我母亲送掉，是大姐不让，留下了我，并取名留春。大姐最疼爱我，每当寒暑假回来时总和我一起睡。她对妈妈很体贴，对弟妹很爱护，每天早上总要帮妈妈做完扫地抹桌等琐事，才和弟妹一起上学。她的一双手也很灵巧，编结线袋、挑十字红，都很精细。她读书很用功，旧时女孩子读书还不多见，乡里也没有学校，只有私塾，她就跟着叔父们上私塾，因学习认真，大家都称赞她，父亲更宠爱她。1912年春天，父亲和大叔父把私塾改创为葫芦兜初级国民学校，她读完后进入黎里女子学校，和柳亚子的妹妹

柳均权（柳静）同班同桌，柳均权对她的刚强个性和嫉恶如仇的思想留下很深的印象。

1919 年 9 月应春大姐去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学习，直到 1921 年毕业。1922 年远离家乡去厦门集美女子师范执教，后到松江景贤女中以及黎里女校教书。在她读书和工作期间，每当假期回家来，常在晚上带了我去农民家中访问，一谈就很晚，往往要我催她多次才回家。她常对父亲讲，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要彻底铲除。父亲听了也很受触动，所以后来能允许和支持她参加革命工作。有时晚上大姐在场上练体操，挥手棒，还和秀春姐姐一起跳“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场上挤满了大人小孩，笑声不绝。她常讲，学体育就是要身体好，摘掉“东亚病夫”这个耻辱称号，所以后来也让三姐秀春进了体育学校。

大姐应春对革命主张不但大力宣传并能身体力行。当时提倡女子剪发，她认为这样省时、便当，就剪去了发把，父亲知道后严厉责备她，但她坚持了自己的主张。那年放假回家，有的长辈亲朋们嘲笑她，但她并不恼火，反而说服了她们，并把我和堂姐妹的发辫也剪去了。还对我们讲男女平等不要穿耳朵。从这以后，我和几个堂妹都未穿耳朵。大姐对民主革新、反封建的事，行动总是非常坚决的。

1924 年大姐在松江景贤女中任教时，受到该校负责人朱季恂，侯绍裘等主张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教育宗旨的影响，并同时受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的影响，她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左派。从

此，她除了尽教职之外，尽力从事国民革命的宣传鼓励工作。

1925 年春，大姐在黎里女校住校时，镇上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她登台演讲，阐述了三大政策是革命需要，要坚持三大政策，革命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富强。当时听众叹服，柳亚子和侯绍裘更为赞许。

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应春大姐在黎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在群众中起了带头作用。

1925 年 8 月，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党部举行选举，成立正式省部，应春大姐被推选为省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因她患足疾，由三姐秀春陪着在苏州医院治疗。她听到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反动派暗杀的不幸消息，深为愤恨。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设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 34 号（今兴业路“一大”会址）。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她抱病奔赴上海就职。她每天工作很忙，彻夜不眠，第二天一早她出去，又投入新的工作。

1925 年 10 月，经侯绍裘介绍，应春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对革命的理解更深，她在 11 月 17 日给柳亚子先生信中说：“我认为入了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一切多（都）可以牺牲的。”1926 年在南京贡院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会上，她又讲：“我们要为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而革命，要知道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才足以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吴江妇女》第二期）。不久她当选为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济难委员会委员。

1926 年 1 月，应春大姐作为江苏代表和朱季恂、侯绍裘一起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大会期间，有省港罢工工人及进步群众组织30万人的集会游行。她深刻感受到工人的力量和热情，深信革命事业必胜，她的革命热情更为高涨。回上海后留在省党部工作，同时参加了上海大学旁听社会科学，经常听瞿秋白、恽代英等的讲课，把学到的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在当年“国际妇女节”那天创办了《吴江妇女》月刊，应春大姐任主编，经费由柳亚子、侯绍裘、张应春等自己负担。1926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举行的中山陵奠基典礼时，右派突然袭击，石子、铁棍乱飞，应春大姐立即和同志们挺身而出，围护着柳亚子，从另一山路安全脱险，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纷纷起来抗议。应春大姐开会演讲，四处奔走，唤起群众关心国家的命运，坚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决心。她起草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1927年3月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南京。应春大姐接到侯绍裘的电报，要她去南京赴职，她就不顾身体尚未康复，不怕形势险恶，毅然赶赴南京。临行前，我问应春大姐什么时候回来，她答就要回来的。可是从此一去就没有回来，没有讯息，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后来知道她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反动派逮捕，在监狱里，坚定不屈，最后被反动派装入麻袋用刀刺死，投入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下。同时受难的还有侯绍裘、刘重民、陈君起等十数人。1928年柳亚子从日本归来，找烈士忠骨未得，才与南社友好及叔父等商量在故乡北莲荡滩建成衣冠冢，并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碑文：“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亚子先生还请画家陈树人等绘了《秣陵悲秋图》，征集题泳，辑成

《礼蓉招桂盒缀语》在报上连载，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和对烈士的悼念。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星红旗已在祖国大地高高飘扬，祖国正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人们已经从温饱向小康的道路上迈进。现在故乡、烈士的出生地——黎星村（葫芦兜），全村学龄儿童全部入学，享受着义务教育，家家吃上自来水，户户用上了液化气，全村装上了闭路电视，实现了先烈生前的愿望。如今，不仅是我们一家怀念着大姐，而且全县全村人民都在深深地怀念着她，用各种方式来纪念她，向她学习，向她致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进！

胞妹　　张留春

附三:

忆同窗好友张应春烈士

应春伟大的人格与革命精神，曾给予我巨大的鼓舞与启迪。唯我年逾八旬，记忆力差，且应春之事迄今已有半个世纪，遗忘颇多。我费神思索，尽力回忆，因耳目不聪，只得吩咐小儿心安笔录整理，以表对好友缅怀之意。

张应春烈士，字蓉城，别号秋石，牺牲时化名金桂华。1901 年 11 月生，江苏省吴江县黎里区葫芦兜人。少年时就学于黎里女子小学，她是我同窗好友，在教室内二人课桌平列而置，放学回家结伴而行，交往密切。应春在校颇为聪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学习认真，各门学科成绩均佳，数学尤为出众。她身体健壮，衣着朴素，常年身穿校服（白色或玄色斜襟短褂，长裤）梳着长辫；为人豪爽，正义感强，深受师长及同窗器重。她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专门学校毕业后，赴厦门集美担任教职。有一年暑假，应春小腿患丹毒，回吴江黎里镇诊治，我曾前往探望。言谈中，她对当时国事日非，帝国列强侵华，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深感痛心，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病愈后，应春赋闲在乡。我把她介绍给家兄亚子，并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侯绍裘同志，走上革命之路。应春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后奉命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机关内工作（即今兴业路“一大”会址）。她一人寓于隔壁亭子间，我曾三次前往拜访，相谈甚欢。她对中国前途、革命

未来，满怀信心，憧憬着祖国富强，推翻剥削制度，劳苦大众的解放。在国共合作时期，柳亚子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侯绍裘任副部长，张应春为妇女部长。1926 年 1 月，亚兄赴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聆听毛泽东教导，应春作为江苏省女代表，亦同车赴穗。1927 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应春随即失踪，后知被害。传闻应春被置于麻袋中，为乱刀刺死，最后沉江灭迹。恶耗传来，我真如万箭穿心，热泪难抑。此时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亚兄亦遭通缉，被迫东渡日本。我曾设法把此事告诉家兄。后知伊亦得悉此讯，并书有七绝一首：六月十日夜梦张秋石女士，翌晨闻其噩耗，感成一绝：

“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眉痕入梦时，
挥手人天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

帼国英雄惨烈死，赤炽丹心万代传。为寄托对革命烈士之哀思，对反动当局的抗议，同志、亲人、好友在黎星为应春建衣冠冢。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踏上新征途，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应春之遗愿实现矣！

柳静(均权)

孙　世　实



孙世实（1918—1938），又名孙方，吴江县七都乡叶港村人。1918年生，是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孙本文先生的二儿子。孙世实从小聪明活泼，品学兼优。1935年暑假，他于南京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孙世实学习很用功，又乐于参加社会活动，热心为同学服务。当时，清华大学办有消费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由学生自己管理的校内福利商店。孙世实入学不久，就被推选为合作社经理，他精明能干，把合作社办得有条有理，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就在孙世实考进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了极点。“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这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年仅十七岁的孙世实，满怀爱国热情，参加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1936年初，孙世实

和黄华、蒋南翔等同志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前后，他在校内外做了许多救亡工作。有一次，北平宪警数百人突然包围清华大学，并分头冲进学生宿舍，搜捕、绑架进步学生。孙世实和其他清华进步学生对这种野蛮行动极为愤慨，他们用砖石砸坏敌人汽车，千方百计抢救被绑架的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孙世实和其他20多位同学被拘捕，关押了三个多月。出狱后不久，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北平学联大会，并被选为北平市学联的交际常委，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6年下半年，在抗日救亡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的孙世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北平市学联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奋不顾身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七七事变以后，孙世实和一部分同学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在淞沪杭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他发动组织上海平津流亡同学会，演讲、开会，四处奔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久，他到了南京，在枪林弹雨中，仍然毫不畏惧地到处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只身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

孙世实一到武汉，正好湖北省教育厅招收乡村



巡回宣传队员。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报名应考，并以第一名录取。不久，他就被分配到鄂西沙市、荆门、宜昌一带开展工作。因当时国民党政府并无诚意发动群众起来抗战，对救亡青年多方限制，宣传队的工作很难开展。没有多久，宣传队又被调回武汉。孙世实决定离开宣传队，与北洋大学来的党员刘讷等一起留在鄂西宜昌，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同当地党员张清华等取得联系，组成了中共宜昌特别支部。后来，在中共湖北省委直接主持下，建立宜昌区委，由孙世实担任区委书记，领导宜昌及附近的枝江、宜都、公安、石首等县党的开辟工作。这一时期，孙世实多次收到父亲、哥哥的来信，要他去四川读书。但孙世实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他毅然决定留在抗日第一线。当时，宜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孙世实和另外一个同志住在一座破楼上，一上楼，板楼就咯吱咯吱乱响。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办公桌，只有一张像厨房里大案板似的桌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孙世实和他的同志们坚持在宜昌地区开展活动。他经常下乡到所辖各县去抓党的开辟工作。在市区，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青年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多方面团结青年知识分子。他把市区追求进步的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帮助

流亡过境的青年得到安定的生活，并努力把一些中间人士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当时年仅20岁的孙世实都干得很出色，很老练。

孙世实在宜昌当区委书记时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韦君宜是区委的组织委员。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在宜昌又一起工作，两人志同道合，逐步从同志关系发展到恋爱关系。1938年夏，省委调孙世实回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队部训练部长，不久任省队代理队长，并兼任全国学联干事。韦君宜也调到省委机关工作。这时，日寇已逼近武汉，孙世实和韦君宜都把全部精力扑到抗日救亡工作上，整天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唯一谈恋爱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散会之后在回所时同行的一段马路上，即使是一点时间，谈话的内容也大多是工作和学习。

1938年10月，武汉即将沦陷，在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和一些机关团体分批撤退。孙世实勇敢地留守到最后，直到10月下旬才撤离。本来，孙世实可以乘一班客轮先走，但当时与他同行的原沙宜中心县委负责干部李声簧身染重病，因没有铺位不能走，他便坚决地留下来伴护李声簧，随留守武汉的《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乘“新升隆”轮船撤离武汉。10月23日，“新升隆”轮行至

湖北嘉鱼燕子窝附近江面时，突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作、　射。一霎时，全船火起，难民中许多老人、妇女、小孩哭着、喊着，乱成一团。这时，船很快地下沉，头顶上的敌机仍在“咯咯咯”的　射，情况十分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孙世实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危。他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把李声簧安置在一张倒放的方桌上，拖到江面，让他飘离沉船，结果，身患重病的李声簧得救了。而孙世实则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0周岁。同船遇难的有100多人，其中有25位是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

1938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重庆为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壮烈殉难的25位同志举行了“保卫大武汉殉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吴玉章、秦邦宪和董必武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致悼词。邓颖超专门写了哀悼诗，高度评价死难烈士的革命精神。重庆《新华日报》为死难烈士出版了追悼特刊。

（沈恩德整理）

附一：

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殉难烈士

新华日报总馆及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同志于武汉撤退时，乘新升隆轮于嘉鱼附近燕子窝遭受敌机惨作。新华日报馆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铟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李元清、易竟成和八路军办事处张海清、赵兴才、徐挺荣、伍高年、傅世明、韩金山、张清新、孙世实等壮烈殉难，同人等谨致沉痛之吊唁！

陈绍禹　秦博古　吴玉章　董必武　恺　丰

（原载 1938 年 12 月 5 日《新华日报》）

附二:

敬悼新升隆轮廿五位死难烈士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心头在悲愤,
不须悲哀,
不须流泪,
燃烧起民族仇恨,
怀着一颗创痛沉重的心,
悼念新升隆轮上为国死难的烈士们!
敬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血债要以血来还。
在民族血债和灾难的面前,
大家哪能再分你我?
我们必须团结一心!
坚持抗战到底,
赶走万恶的帝国主义日本!

野蛮的倭寇进到武汉,
凶残的敌机各处横行。
残杀了中国优秀的儿女!

残杀了抗战英勇的斗士!

失去的是他们的肉体,

永生的是他们的事业精神。

李密林、潘美年、项泰、孙世实、张海青等烈士的精神不死!

警告敌人,

勿狂欢得意,

炸毁了我们烈士和同胞的生命肉体,

但再也炸毁不了全中国人民已锻炼成的抗战到底的意志!

摧毁了我们的城市和江轮,

但再也摧毁不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一致!

失去的是廿五位烈士,

继续的有千百万的抗敌勇士!

永远纪念着烈士们无比的英勇:

当船身已经烧了一半的时候,

在猛烈的爆炸中,

在焚烧的火焰里,

我们最可敬佩牺牲了的勇士还沉着地立在船面上,

"救火,救人,多数同志的不死,是他们之力居多"。

(注)

这最伟大临难不苟的精神,

最无比的革命忠诚坚定,

最高度的爱人助人的友爱热情。

在神圣的民族抗战中,

你们用尽最后的一滴血，
用尽最后的生命力，
发扬着无尚的英勇，
交织着写下了可歌可泣、生动感人的光辉不磨的伟大史迹！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
你们奋斗到最后，
在撤退后艰难的途程上，
继续奋斗到“死而不已”！
是抗战中最英勇模范的战士！
是中共的最优秀模范的干部同志！
永远纪念着他们啊，
永远学习着他们的热烈、伟大精神！
誓为死难烈士复仇！
誓为民族雪耻复兴！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烈士们的精神长存永生！

邓颖超

〔注〕：从新升隆轮船脱险的李克农同志来信。

（原载1938年12月5日《新华日报》）

附三:

回忆我的二儿子孙世实

我的二儿子孙世实，1918 年 3 月 21 日出生，从小就学习好，小学时演讲第一名，考中学时考取第一名，还经常得奖。后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领导一二九运动，193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外搞革命工作，很少回家，但关心家中父母。在武汉时，他父亲叫他回来读书，他来信讲救国要紧。有一次国民党汽车被他们打掉，反动派把学校团团围住，把他们关起来，经过好长时间才放出来，身上生了许多疮。世实喜欢帮助人，有一次帮助同学找了工作。1938 年八路军办事处留守武汉，世实最后撤退，坐《新华日报》的轮船，到途中，日本飞机轰炸，他为了救一个生病的同学，把桌子翻过来，将同学安置在桌子上让水淌去，这位同学得救了，后来当了部长。当时轮船烧起来，世实救火救人忘记了自己，最后自己跳下去就无影无踪了。他女友韦君宜同志来信告知这消息，我们全家悲痛万分。同时遇难的还有李密林记者、潘淑校长的弟弟潘美年。后来邓颖超同志主持开追悼会，是我大儿子去参加的。邓颖超说，感谢家长培养出这样的优秀儿子。

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孙世实的样子，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儿子。世实的牺牲是家庭不幸，国家损失。

孙世实的母亲吴钜儒

附四:

哭　世　实

“敌机夺去了我亲爱的人。”当我重写着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掷笔而痛哭失声。再一想起全国不知有多少人都正在或将要写这句话时，又令我愤恨填膺和泪写下，藉使同胞知道，敌人是在怎样的毁灭着我们民族的花朵、青年的英雄，更愿我青年同志，看一看我们自己胜利的道路上是怎样的困苦艰难，我们要如何努力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孙世实，又名孙方，江苏吴江人，中央大学教授孙本文先生的幼子。他在南京中学毕业后考进北平清华大学，攻读经济，人很聪明，在学校里就负责过一些年级会、学生会、合作社等社会工作。他本来是一个诗书门第的克家之子，进清华就很用功，想好好地读几年书。在余暇的时候喜欢打球、游泳，极其活跃。到一二九运动开始时，他还没有做甚么事。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越来越凶，罪恶累累，北平学运也越发蓬勃起来，使身在国防线上的北平知识青年再也不能忍受了。眼看敌人在我们校门外面演习，使校内有血性的青年人毅然而起，世实即于此时，接近了热情有为的朋友，读了许多救亡书籍，使自己转变了。他把优越闲逸的生活坚决抛弃，加入“民先”，又进入“社联”，将自己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

他在学校做了许多救亡工作，随后当选为清华大学出席北平学联的代表。在学联工作时，担任交际常委，为时半

年。他深感做工作应该配合同学的生活，不能专门闭着眼喊救亡。

工作既久，读书既多，使他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前途和民族的前途、人类的前途，即于1936年的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芦沟桥事变以后，他跟着同学，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发动组织上海平津流亡同学会，至今许多上海流亡来的同学还记得这个英勇的青年工作者。不久，他又跑到南京，在南京炸弹如雨的时候，他在枪林弹雨中也丝毫没有影响工作。及至南京危急，其父本文先生随中央大学入川任教，叫他或回湖南清华，或到重庆进"中大"，但他坚决不肯。

那时，武汉清华的同学很多，大都回湘读书，而他却只身跑到武汉，从事救亡工作。适值湖北省教育厅巡回宣传队正在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登记，他就应考受训，以名列第一录取。自此，他随宣传队下乡，到鄂西沙市、荆门、宜昌一带工作。后来这支宣传队被教育厅调回武汉，他就独留宜昌开展工作，担任了宜昌青年救国团的总务，该团召开全国代表会时，他被选为执委。

那时，我也到了宜昌，看见他父亲本文先生、哥哥世笃给他写的信不知有多少，反复劝他赶快回川读书。但他无论如何不走。起初本文先生还寄钱给他，后来连钱也不寄了，他就东扯西凑，着破鞋，居敝屋，仍勉强在宜昌支撑下去。那时的宜昌，不像现在热闹，简直没人过问，我们在那里焦头烂额地想办法。世实以为人恳切，工作努力，教书开会、组织团体、起草计划、写文章作提纲、写钢版印油印、上街跑腿、下乡宣传，无一不干。回忆他和我同握着一支笔，修

改那《统一战线讨论大纲》，恍惚如昨日！

直至武汉更趋危急，我们又跑回武汉。他想到前线去工作，结果没有走成，在"民先"工作，由训练部长兼代湖北省队长，并兼中国学联干事。当敌人迫近武汉时，他很勇敢地留在武汉。直至二十日以后，武汉准备撤退，他才作走的打算。我陪他一起找票上船寻过座位，而因另一朋友足染重病，没有铺位就不能走，世实就改变主意无论如何不走，非要守在武汉设法伴护那位朋友不可。那时，我就先走了，后来知道他乘了新华报馆的"新升隆"船。但等来等去，不见他来，孰料消息传来，他竟身遭日机狂炸，惨死长江，为民族解放事业，流了他最后的一滴血！

噩耗证实，朋友痛悼，世实死而有知，必不以这牺牲为冤。如今敌军迫近长沙和沙市；海口全失，河山丢了一半，全国人民，不知死所！我们的好青年这时候不作出牺牲，还等到何时！世实已死，我们的菲史伟、陈柱天、李密林等已死，死一个有一个的代价，死一个表现了一个的英勇！

我记得世实在世时，我和他谈起史伟、陈柱天，他说："我若死了，你一定要替我写篇传，好告诉我散处南北的朋友们。"不意"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人已死去，遗言怎能忘掉？怎能不写？他是中国最大多数英勇青年中的一个，他的一生经历，以优裕家庭的子弟而抛家弃业勇往直前，最后为工作而涉险，死于敌手，这是我中华优秀青年所必有、所应有的节操！未死的朋友，看看我们的路子罢！愿踏着孙世实的血迹，前进到胜利之路！

韦君宜

(原载 1938 年 12 月 6 日《新华日报》)

附五:

牺牲者的自白

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我的恋人在敌机底下牺牲了。我不是在构造什么习作里的故事，这是真实的啊！我说不出，我想不透，怎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曾听见，甚至看见过多少悲惨的故事，多少个落在悲惨命运里的人。我也同情他们，为他们悲痛。但是那总象和我隔了一层幕布。到今天，这不是故事。不是笔底下可歌可泣的 drama，这不是幕布上的电影，这是灾祸。当真的灾祸端端正正打在我的前额上，我的感情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它，不知要怎样才好。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你们倘没有过这种经验，你们是无法想象我这时候的心情的。正如前一个月的我无法想象那些被难者家属的心情一样。但是现在我可知道了。原来竟是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们看看我，你们再闭目默想一会，中国有几百万人正度着我这样的日子。你想，世界上怎竟会有这样悲惨的事情！从古至今，有没有过这样悲惨的事情啊？

我首先，费了许多力气使自己相信，他的确死了。这件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起初我实在是不信，我真不信！他没有病，没有灾。遇难前两天我还看见他，笑嘻嘻的，并没丝毫要死的预感。握别时我把一切都替他想到，无论如何也

没想到死上去呀！怎会突然死了呢？我并不悲痛，没有哭，只感觉异常奇怪。随便和他同行的怎样向我描绘他的死状，我只觉不大象真的。朋友们那些为了解劝我而说的"他或者逃掉"的话，我一听就觉得很合事实。我满有把握的等他回来。写信，拍电报，访问，到每一个有一线希望的地方去，我用尽心力，搜罗"他或者会活"的一星半点事实。我细心的替他揣想，遇难那时，一共有几个逃掉的可能。假使碰到第一个可能，应该几时到，碰到第二个可能，应该几时到，……我简直把一生所有的希望都放在那一点摇摇欲断的幻想里，我静等他来。

但是时间越过越长，我所找来的事实完全与当初的愿望相反。"他死了！他死了！"每一个片断的消息都逼我相信。现在，除去我自己心中不相信他死以外，我再也找不出一点他会活的根据来了。无可奈何，我现在必须作相反的努力，克服心里这一点点可怜的盼望。天啊！使自己相信自己所爱的人死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但是我竟做了，我每天拿着他遇难地点的地图仔细研究，设想着那时炸弹落下，他受了伤，一定跑不动，设想他负伤坠水，一定无法泅水上岸，设想他抓不着可以攀援的东西，被人挤落江心，设想他即使上了岸，而那一带河渠密布如网，现在又正是火线，他也绝无逃得回来之理。我用种种有力的理由，将自己这不讲理的信念打倒。我告诉自己，千遍百遍的告诉自己："他是万无生理，万无生理。"甚至我故意闭目瞑想他遇炸后的惨状。我将过去耳闻目睹以至书报上登的炸死的尸身的形象，完全加在我的爱人身上。什么血肉横飞。一条腿挂在树上，肠子拖出几尺长，肉片在墙上贴着，……等等，我想象，那都是他！

是他！现在他已经成为那种样子。碎裂的肢体永远不能再连起来，永不能再成为活人了。他不会再说话，不会再笑。他的嘴唇已经喂了江鱼，它们把他吞了，把他的血肉嚼得碎烂淋漓，正如我们吃着鱼羊一样，唉，天啊！我努力想，这样想够了。我再一想起昔时他和我欢笑言语时，我才象触了电一样，把眼泪引下来了。我大哭，发狂的，忘我的，拚命的哭！

哭！似乎哭就是唯一的办法，胸口也痛，脑袋也痛。哭了一场，擦干眼泪，再哭一场，我恨不能立时哭死。我才开始悔恨，痛骂，哀号，我才弄明白原来我已经没有他了。这一生一世永远没有他了！捶胸，顿足，咬唇，裂发，……我将这些普通举动完全做过，简直发了狂，我不要活了！痛恨别人，好象这是人家把他坑了的。一想，那时不是某某，他不是不会走这条路吗？不是某某，他是可以逃吗？不是某某……唉呀！可以活的道路太多了，而他偏偏死了。我咬牙切齿，简直想找别人去索命。我失去了理智，忘却究竟是哪一个杀了他，只是被当前的飞来横祸把头脑打昏了。我怨恨这样凑巧的事情。好象这事是"凑巧"造成的。是我们两人的命运恶劣，单单撞在日本飞机上。我怨命，恨命，是我的命太苦！

我痛哭自己的苦命。这时，这忘却了工作，忘却了责任，忘却了事业，再也记不得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读的书，平日的言论，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完全忘光了，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失去了心爱的人的可怜的女子，同旧小说上诗词上那些薄命的恨月愁花以泪洗面的女子一样，如同任何乡村里有惨酷命运而向神佛哭求的村姑娘一样，我已经失

去了自己，我这时不仅脑子里完全充满那种想法，甚至有意识的以那种人自居了，绝望！一个身子掉在绝望的深渊中，世间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救拔起来，四顾无援，自然来了那"疾痛则呼天"的熟路子，我竟当真做了多数中国女子在这种时候所惯做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我在痛昏中求神了，祈祷了，卜筮了。除了天以外，再没别的能救他，没别的能救我。我简直不再用脑筋，一迳做着这些事情。我想，"只要能够救了他，随你是上帝，是仙，是佛，是鬼，是怪，是什么帝君神祇，我都相信你"。按照卜来的吉语，他一两个月就会回来的，我就算着日子：当这时，我只盲目的欣喜着，努力按住自己的思想不许它动，不许它拐弯。因为我知道，只要它一拐弯，这美梦立刻就破了，悲惨的事实铁一样摆在我面前。

我只恨自己，究竟不能完全变成一个村姑，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子。我不能不用我可恶的头脑。它把现实推给我，叫我无法将它推回去，无法不承认。我终于承认了，钢刀一直刺进我的心胸，它逼我非马上想办法应付不可。光是哭是不行的。哀求上帝也竟招不来他的魂魄。我就用力拨开一切，用力想，怎么办呢？

最初我完全没有办法，知道刺心欲裂的痛楚使我简直无法生活，"失去他而活着"！这件事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那怎能够？当我读了一本书后想和他谈，写一篇东西想给他看，斟一杯新茶想给他喝，这时忽然发现他已成为四分五裂的江上浮尸。我，我怎样读？怎样写？我怎样生活？还是不活的好！不能活了！不能活了！于是我非只一次地想自杀，计划自杀。毒药买在手里，想一想，死去的确比这样活着痛

快的多。从前我也不怕死，但是总觉得这件事和我实在离得太远，从来不去考虑它。死也许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却实在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回什么事。这一下，我最亲密的人忽然死了，使我忽然明白，死就正站在我的门外。并且我又明白了，死去和活着原来是一样的平常，一样的容易，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它。死！死！死！这个念头在我脑筋里盘旋了几星期，我无日无夜用尽毕生之力来同它战斗，我把先哲的诏示，同辈的期许，自己的信念，过去的斗争，……等等一切，完全拉来组织成军，同我想死的念头作殊死战。这时"死"对于我真是一个最平易、最舒适、最安稳的路子。我想死的心正同他活着的时候我想同他在一起的心一样强烈。他活着，我和那念头作战，总没有得到胜利。现在，我，我不能！非要胜利不可！在无数的苦痛中挣扎着。我每次把毒药的瓶子举起来，想一步跨过这生死之界。幸亏在万分危急之中我的理智还不肯服输，它背城借一的坚决战斗。所以我往往是一手拿着杀人的药瓶，一手按着一本敌军暴行，抗战现势、革命前途……等等的书，把这些书上的字，一字一字放在我牙齿上咬啮，我这样把我的死志用力吞了下去。就这样！每天这样！朋友们！我愿意有人心的人想一想，这是什么味道！就这样苦斗，有时还免不了闪过"管他呢，死了痛快"的想头。无可奈何，我只好告诉自己："死就死好了，但是我这时候，这样死去，我是对不起他的。权当把头颅寄在自己颈项上，我应当替他报仇！我活着，只为了报仇"！

是的，我活着，只为了报仇！这血海的深仇呵！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报复，但是，无论有什么可能的方法，我

都是愿意用的。我是柔弱的人，我知道，而且还是一个软心的女子。记得从前在学校读生物学的时候，学解剖，要我动手杀死一个青蛙，我举着刀子，再也割不下去。还是同组的同学将它弄死了。我咬着牙来剥皮剔骨。自此以后，永远不吃田鸡肉。这习惯到今天还保持着。我不愿，我不忍伤害任何活着的东西。但是今天呢，今天我相信自己能杀人！我不害人，而人害我。现在，无论天底下曾经有过的那一种残酷行为，叫我做，我都可以毫不犹豫的动手将它加在我的敌人身上。仇恨呵！仇恨使弱者仁者忘了自己，仇恨使弱者变得比任何人更凶猛，使仁者变得比任何人更残酷，更忍心。连命都不要了，那末，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吓唬我，可以使我顾惜的？恨极了的时候想过，我要坚决反对优待俘虏的办法。若是现在我手边有个日本俘虏，我必定用尖刀挑出他的眼珠割去他的耳鼻，剜出他的心肝，叫他也象我国被炸死的人一样。若是来的多，我必定来一个杀一个，个个都不用活着，叫他们也尝一尝，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只有这时我想到我们大不可比的仇恨，民族的仇恨！我明白了！以前哀痛至极无以自解时，我也曾搜求许多旧籍新编，希望从那些悲惨的故事中能找出和我相类似的来，希望从那些哀感的吟咏中，能找出替我发抒些胸臆的句子来，但是再也找不出！好象从古以来的伤心都没有我的伤心大，古来没有象我这样遭遇悲惨的人。现在我倒明白了，是的，我的遭遇是空前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惨遇是空前的。我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呵！这不能想象的巨大灾祸！

我的眼前展开一幅图画：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天呵，纵横几万里，每一里的每一尺每一寸，都发生着象我身受的这样惨剧。多少个中国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姊姊，妹妹，哥哥，兄弟，……没有了！都没有了！这些尸身堆起来要比日本皇宫的墙厚几万倍，连起来可以从此地接到东京。他们的血和我们这些亲人的眼泪加在一处，大约填满渤海湾也不是什么难事。我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但是这几百万几千万个死者的亲人，个个都和我一样，是有情感，知道爱和憎的人。去数罢！就是这么多粒沙子。也够堆成一片沙漠，何况是这么多还活着的人！竟把我们都弄成这样！竟能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还可以叫做"人间"？我的他是聪明的，善良的，勤勉的，中国最有希望的青年，并没有丝毫应该死的道理。他并无哪一点比不上你们之中的哪一个，也无哪一点比不上碧眼国家中任何一个还在读大学的青年。我们死去这无千无万的人，全没有那个有该死的地方。但是他们竟无缘无故，半途失去生命，无缘无故把父母的肢体给人家撕成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血肉。我想大声向世界询问，这究竟是什么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我于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还以为我们现在可以讲和，可以不抗战？为什么有人还在为自己子孙多少年的私人生活打算？为什么有人无论如何不肯把自己所有完全交给抗战？是因为还觉得可以和日本帝国主义活在一起，他们没有给自己损害，觉得日帝总不至于刚好就把自己那一份抢了去吧？是罢？可是朋友们！当我接到这噩耗的前一天，前一小时，前一分前一秒，我也没梦想到这件事竟会掉在我的头上呵！它和我之不相干，正如和现在街上的每个路人之不相干一

样。“中炸弹好比中航空奖券”，这是我和他和许多朋友都爱说的话。但是我单单就中了这号航空奖券！它明天不会落在我左边的人头上去？后天不会落在我右边的人头上吗？朋友！你能不能担保？

我也曾为自己打算过，我没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就会马上把我个人连根拔了。虽然明晓得应该献身，但总没以为今日此时就是轮到去死的日子。总好象死现在还是别人的事，我暂时还可以留在没有炮火的地方说说写写跑跑，还可以在最小范围内为自己保留一点快乐。我这生活还可以同前线血战的生活并存于中国之内。但是今天，今天呵！我感谢日本飞机，它教训了我，它告诉我，它到此地来不是打别人，正是打我，所毁灭的不属于别人，正属于我。它怕我还吝啬，就这下子把我弄成了光蛋，再也无法打算，无法留恋，再也不用想任何最低限度的保留了。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我总算倾其所有，使同献者再没话可说了。我想退去，但是民族的神灵对我说：“不！你还有”！“我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自己的生命”！

是的，现在我只剩下一件，——自己的一条命！此外，爱，快乐，前途，……完全没有了。只有最后的这件东西，命，我现在是慷慨极了，毫不吝啬它。——人，只有这一件东西，总是很难活下去的吧。——亲爱的朋友们！我活着只为了报仇！痛痛快快的报仇，直接的报仇，性命的仇，我的仇，中国的仇，我们——百年来千万方里列祖列宗的深仇大

恨呵!

我要把子弹直接打进敌人的胸口，要敌人的血在我手中的刀底下流。为了要看见仇人的血，我要活下去，此外我没有任何企图，没有任何思念!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的命运莫同我一样。但是，我又明白，没有把敌人打出中国以前，你的命运随时可以同我一样! 你已经想好了你的办法了吗?

韦君宜

(刊于 1938 年底重庆《抗战文艺》)

附六:

一 段 补 白

《牺牲者的自白》这篇东西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底的重庆《抗战文艺》，距今已经是四十来年了。当时，曾经得到一些朋友的欣赏，也有人看了它为我耽心。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还为这篇东西挨了不少的批斗。现在重读一遍，我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把生命献给了革命，这可能正是一种幸福。我想他临牺牲前一定是心安理得的。只是把痛苦留给了后死者。当时，我在几近疯狂的悲痛中写了这篇自白。现在我要批判它当然容易，又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又丧失立场……。但是我现在想的首先却不是批判，而是想不到四十年之后，时间的救主早该洗掉那已成过去的痛苦了，可我今天在回想中的痛苦却比过去更深刻。——当然，是另外一种性质的。

他是真正可以称为一个献身者的。名字叫孙世实。牺牲的时候只有二十岁，职务是中共湖北省青委委员，民族解放先锋队湖北省队长。以前还担任过中共宜昌区委书记。他父亲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著作等身。这么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青年，生活道路本来该是早定了的，但是，他却选定了另外一条路——通到牺牲去的路。

我在清华就认识他，知道这个韶秀的江南少年是北平学联的常委。

"七七"抗战爆发了，大家都到南方。一九三八年初，我被党组织派到宜昌去做地下党工作。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大姐叫我隐蔽在叔叔家里。我有个二叔在宜昌盖了所小洋房，由四叔四婶看管。我就以侄小姐的身分，一个人住着里外两间房。钱大姐说：过去宜昌党只有几个人，现在要建立宜昌区委。第一次区委成立会就是在我这会客室兼书房里开的。正是夏天，我穿上新做的白纱旗袍，好象要请客似的在家里等着他们一个一个来到会。一看，原来新区委书记就是老同学孙世实，我是组织委员。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党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叫他在武汉投考湖北乡村合作训练班，到农村去想法开辟工作。他考取了，分到宜昌一带，可是，他们下了几个月乡，发现实在没有办法做什么工作。他跟几个进步同学套用当时一首"打倒汉奸"的曲调，编了几句歌词道："……大汉奸、党国要人，小汉奸、联保主任……"后来，党才决定他留在宜昌来搞地下党。

他和我们的宣传委员共同租了一间破楼住，就在离我家不过三四条胡同。他们都没有职业。我到那个楼上去过几次，看到他的生活过得实在不大象样子。那是一间旧式中国楼房，一上楼，楼板就咯支支乱响，所有的家具全都看不出到底是黄色、赭色、还是黑色？他们也没有一个正式的书桌，只有一张象厨房里大案板似的桌子。不过小孙出门倒都还是穿着洁净的白衬衣，蓝西装裤，头发梳得干净整齐的，我猜他是为了工作方便而努力做到的。

由于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实在不好，所以每次开会以及他和我商谈工作、新党员入党仪式等等基本上都在我家进行。

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们都还那么年轻，来多了，四叔四婶自然就认为他是我的“男朋友”。他们这个猜测，倒为我们的活动涂了一层保护色，使我们增加了一些安全感。

我那间屋子有干净的书桌、沙发、花瓶，墙上挂着一些北平时期的旧照片，配着李后主亡国后的词，窗外有一树丁香花，倒是一个谈天忆旧的好环境。但我们的确每次会面都谈工作，这是自觉的自我克制。因为那时我们负担着在几十万人口的宜昌宣传真理的任务，无权把自己当作一般的少男少女看待。

宜昌区委按规定下辖公安、石首、宜都等好几个县，过去有的有过党的活动，这时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小孙就负担起到下面奔走开辟的任务。过些天就要出去一趟。在市内，有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和青年刊物，要和它们作斗争，有追救进步的小学教师要去组织领导，有流亡过宜昌的青年要设法稳定下来，还有中间人士要争取……所有这一切，都加在年仅二十岁的小孙身上。现在想起来，二十岁，那不还是一个孩子吗？可是，那时候我却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大约也是沉重的工作负担促使他早熟，他对这些复杂问题，很少是一开口就随便说出什么话的，总要仔细想半天，想清楚以后就发表明确的意见。

他在我的书房里起草党员气节教育大纲，给上级写报告，有时候，他写着，我替他裁纸。也有时候，我替他沏茶。他也同我一起到有的支部和群众团体去。我跟他一起去过宜都县接头。我以阔小姐身分去参加一些上层妇女活动和救济难童活动，这方面比他多些。而他参加的下层秘密活动的青年救亡活动却比我广泛得多，我真的觉得他比我成熟。

那时候，从武汉到重庆，宜昌是一个必经的中转站。当时，清华已经和北大、南开在昆明联合成立了西面联大。有些清华同学路经宜昌，来家看望我，问我为什么不回去复学，蹲在这里干什么？我只好含混答复：家里有点事呀，父母想让我经香港去美国留学，现在还举棋未定呀……。至于小孙，就更没有办法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了，只能说是在做救亡工作，可是又没有任何团体名目。那个破楼实在不便接待来宾，他只好常常避而不见老熟人们。什么上大学、去留学，在当时我们的头脑里毫无考虑的余地。小孙的父亲和哥哥也给他来信，他就象捉迷藏似的编各种谎话骗他们。他跟我说，觉得这很好玩。

后来，我们先后调到了武汉，这正是武汉救亡高潮已经过去，国民党已经下令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等三个进步团体之后。我们的任务是恢复民先，进行地下活动。这时候，我又取消了阔小姐身分，住到富源里省委机关，当职业革命者。小孙则住在华商街保和里中国学联机关。我们的住处都是从早到晚到开着门，川流不息地人来人往谈工作，兼充集体办公室和会客室，根本没有私人生活的余地。这时候我和他之间已进展到爱情关系，我们唯一谈恋爱的时间地点就是散会之后在马路上同行一段。

我们夜晚钻到工厂区，白天也跑进上层团体与家庭。一民先队的成员是广泛的。我们布置组织武汉撤退后民先队员到鄂中打游击，因为眼看着国民党决不会守武汉了。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一同踏着满路的月色出来。我忽然说："我真想到黄鹤楼上去看一看长江。可惜没有功夫。"他说："将来我一定陪你去，将来！"然后话题就转到将来。我说

将来革命胜利之后我要搞文学，他说他要搞经济学。还说将来还是要读书。等革命胜利以后一起读吧。我们安安稳稳地一块儿找一间书斋……

国民党终于匆匆撤退了。大街上已经写满了日文标语，是准备给进占的日本兵看的，这就算是他们的“心理战”了。我们党则分兵两路，一路带人到鄂中去打游击，一路跟省委撤到鄂西。我和小孙分到第二个班子，组织分配，没话好讲，决定我坐招商局江轮先去，小孙随钱大姐后走。

那天晚上我在逃难的人群中挤上江轮，在趸船里蹲了一夜，次早才从人的夹缝里想办法挤到了我预定的舱位。一看，舱位上留着小孙的条子和一小包糖，原来昨晚他挤上船来送我，没有见着。条子上说他们马上就来，跟《新华日报》走，叫我好好等他。

我到了宜昌，回到那个家里。没几天就听说长江上撤退的轮船遇炸，而且是什么带“新”字的船。我心里惴惴不安，一天几趟往《新华日报》宜昌办事处跑，终于有一天晚上，《新华日报》新升隆轮上活着的人来到了。我跑去问，迎面就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大叫一声，哭着出门。次日去找钱大组，走进门喊一声“大姐”就坐下哭起来，钱大姐详细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这条船在离武汉不远的嘉鱼燕子窝停泊。好多人都上岸去了。钱大姐、小孙、省委另几个同志，其中包括一个病重不能行动的小李（李声簧同志）没有上岸。忽然，从武汉那边来了日本飞机，见有这艘船，就低飞扫射，又投炸弹，船上起了火。这时候，能游泳的纷纷跳江往岸上跑，不能游泳的也只得抱一块木板跳江，钱大姐也跳进江里去了，

后来被一只江上的小船给捞救起来。她上了船，忽见江水上飘过来一张四脚朝上倒放着的方桌，方桌肚里趴着一个人。一同遇救的同志们喊："钱大姐！那不是你那生病的小李吗？"他们请船家划拢去把那个人救起来，一看果然是小李，再一问，原来在那机枪在头顶上扫，大火在身边烧，生命危在顷刻的混乱时候，小孙没有跳江。他首先跑进舱找了这张方桌，倒过来放在船边，然后再进舱，抱出小李来，再把桌子放下水，把小李放进桌肚。再以后，他自己才向江里跳。但是太晚了！等钱大姐他们在岸上清点人员的时候，已经再也找不到小孙了。永远找不着了。

我知道小孙的游泳技术是很好的。船离岸又不远，他这分明不止是遇炸，而是为了救援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十分镇定从容、十分果敢的牺牲。他肯定是怀着对同志的无私热爱，对共产主义的光明理想，从容赴义的。若有遗憾，大约就只是遗憾他没能看他成天想念的"将来"吧。

这就是《牺牲者的自白》里所说的那个青年。也就是我——那年只有二十一岁的少女，会写出这篇三十年后还要挨批斗文章的由来。

以前，我曾为小孙的不能见到解放，感到无法弥补的惋惜。一九六二年，我坐长江船由四川到武汉，重过嘉鱼燕子窝，正在下午。只见江面很宽，夕阳将坠，天水俱红。往事在我心里萦回不去，叫我到哪里去寻觅他的英魂啊？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悼念他，低声唱了一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为他招魂，歌曲的抒情旋律更引动我的悲怆。此时此境，叫我不由不深切地感到这红色的山河正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用血换来的，而今只有我见着，他却见不着了。当时我倚着船栏，曾

吟成一首诗:

茫茫一水拍天波
又到嘉鱼燕子窝
山带残阳犹血色
江声呜咽泪还多
捐身早去君无憾
华发空悲我奈何
血换山河独我见
慰魂一唱五星歌。

我又一次落下了泪。

可是，后来我却反而觉得该羡慕他了，真不应当悲痛，他死的是那样纯洁，全没有我这几年所有的一切痛苦，完全用不着我去为他招魂。他没有丝毫杂念地为新中国而死，为了祖国、为了共产主义，把一切都舍弃了，包括他年轻的恋人——我。这是境界很高的死啊，人生能如此以去，还不是幸福？后来在牛棚里、在干校中，特别是在为《牺牲者的自白》受批斗时，我还不断想起我们少年时代那沉醉在理想中的最快乐日子。甚至我觉得在写《牺牲者的自白》时我自己那种痛苦，也不失为另一意义的愉快。因为我一面哭一面还是在想复仇、想战斗，在昂奋地想为"将来"的到来而牺牲。"虽有刀锯鼎镬，甘之如饴"，那并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谁知道我这个幸存者会活得这么长! 我活到了他们所想望的"将来"。这个他为之付出年青生命的"将来"。我看到了一切，包括自己挨斗，包括十年浩劫，包括浩劫中被整死的已经白发盈头的钱大姐，包括十年浩劫后又泛起的许多沉滓。重读前文，我的心千头万绪，无从说起。光明、理想、

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他那样纯洁的热血难道白流了吗？人们啊！这样纯洁的热血当作水一样任其流去，是有罪的啊！怎么可以这样呢？用他们的热血换来的山河怎么可以随手糟蹋呢？我这才感到了真正的痛苦。——为当年失去他的痛苦所远不能比较的痛苦。我老了，不愿意用我的无穷感慨伤了现在仍在艰难中搏斗的战斗者的心，只简单地如实作这一段补白，以补四十年前旧文的不足。

韦君宜

（载于《似水年华》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丁　秉　成

丁秉成(1908—1939)，原名陈显堂，曾用名李愈秋、丁月搓，1908年生于山东省峄县（今为枣庄市）。他早年参加革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夏，丁秉成受中共中央特科的派遣，到江浙太湖地区开辟工作。先后随他来吴江的有张琼英、施光华等近30人，其中有少数中共党员，其余是中央特科的秘密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的成员。他们来吴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改造杂牌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丁秉成到吴江严墓后，通过进步人士的帮助，使“武抗”人员陆续进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政工队，并由丁秉成担任政工队的指导员。他利用政工队作为“武抗”的活动基地，团结了一批青年，通过办识字班、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演短剧等活动，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丁秉成对青年关怀备至，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和

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望镇女青年沈月箴，年仅20岁，在丁秉成的直接启迪教育下入了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丁秉成与上海党组织秘密联系及文件传递，大多是由沈月箴完成的。丁秉成还指示沈月箴利用当时任县政府交通员，常去三战区传递公文的便利条件，搜集吴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及时不断地送交给上级党组织。

1939年春夏之间，中共吴江支部在严墓车家坝成立，丁秉成为书记，张琼英、施光华为组织和宣传委员。同时，又建立“武抗”吴江支部，丁秉成任负责人。

为了早日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丁秉成废寝忘食地四处奔走，不畏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吴江境内的游击队情况错综复杂。七都到横扇一带有一支游击队，是淞沪抗战中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组织起来的武装。丁秉成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通过同里镇人、中共党员王绍鏊的介绍，与该游击队的副司令曹绍纹建立了关系。尔后，丁秉成又把“武抗”成员安插到该部政训处担任总干事，并利用此职之便，在政训处所属的战地青年服务团中，开展对一些爱国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吴江黎里、北厍一带，还有一支200来

人的游击队，大队长郝道生是东北人，队里有不少人原先是东北军的，从上海流散到黎里。丁秉成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示，通过镇上的统战关系，结识了郝道生，直接对郝部进行工作。

1939年春，丁秉成通过关系与太湖别动队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钱康民取得了联系。钱康民是中共党员，与太湖别动队司令赵安民是老同乡老同学，结交很深。丁秉成送示意钱康民做赵安民的工作。当时太湖别动队已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改编为江南挺进纵队第三团。由于赵、钱两人治军甚严，该部军纪作风较好，三战区怀疑该部内有共产党活动，以调虎离山的方式，安排赵安民去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并派政工人员来该部监视。钱康民处境困难，丁秉成与钱康民研究了应急办法。不久，钱康民利用机会，从第三团里拉出40多人枪，建立了一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由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这支抗日武装，穿港湾，越河浜，出生入死，驰骋水乡，把江浙接壤的吴溇、义皋、大钱一带，联结成一个广阔的杀敌战场。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发展到100多人，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梅村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丁秉成和钱康民率领这支部队与太湖边的群众

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群众视这支部队为自己的部队，每当部队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便欢欣鼓舞，前来问寒问暖，送茶送饭，掩护伤病员，传递情报信件，军民水乳相融，亲如一家。

可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却对这支抗日部队深感不安，视如芒刺。他们企图以“合法”名义收缴部队的武装，被丁秉成义正辞严地顶了回去。

1939年8月23日清晨，驻吴江七都的国民党二十八军六十二师在吴溇附近埋伏下了优势兵力，突然袭击了正在行进中的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罪恶的子弹接连击中了丁秉成的腹部，他顽强地用手捂着外流的肠子，忍着剧痛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牺牲，时年31岁。

第二天，中共中央特科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含泪在胡家兜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深情垂念丁秉成为建立党的武装在太湖畔立下的不朽功勋。

（徐佑永撰文）

钱　康　民

钱康民（1907—1939），1907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革命家庭。他父亲钱涤根1905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长期奔波在外，从事革命活动，无暇顾及家事。但每当他得空回家时，总要带些进步书刊和宣传品给小康民看，并向他讲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事迹，教育他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父亲的言传身教，使钱康民在幼年时期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北伐战争开始后，钱涤根潜回上海建立国民革命军特别行动总队，并亲自任总指挥，动员群众积极配合和支援北伐。此时，钱康民初中毕业，告别家乡，到上海模范中学读高中，与父亲住在一起。他一面学习，一面帮助父亲做些放哨联络工作，多次来往于上海、吴江之间，传递密信，联络吴江人士响应北伐。1927年1月，钱康民父亲不幸被捕遭

杀害。钱康民闻讯后，悲愤满腔，立志要继续学习和工作完成父辈先烈未竟的事业。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和革命斗争的洗礼，磨炼出了钱康民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品格。

钱康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政法系。在大学里，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吸取丰富的知识，先后掌握了英、法、日等五国语言，并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还经常写些唤醒民众、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同时，他仍与父亲的好友何香凝、柳亚子以及中共党员廖承志、王绍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在这一时期，钱康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上海财政局工作，后由组织上通过关系，打入国民党江浙联防处任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康民利用职务之便，将倾向共产党的同乡同学赵安民介绍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特派员黄秉英，由黄任命赵为“太湖别动队”司令。钱康民、赵安民遂到浙江、安吉、吴兴一带发动爱国青年起来抗日，收集流散枪支，组建抗日游击队。经过充分发动，很快就建立了一支500余人、300多支枪的队伍。1938年1月，太湖别动队在浙江省长兴县正式成立，赵安民任司令，钱康民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3月，部队进

驻杭嘉湖地区，继续扩大武装。至7月，已发展为一支拥有8000余人、6000多支枪的队伍。钱康民在部队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战士“先有国，后有家”、“中国人要有骨气，誓死不做亡国奴”，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他还数次拒绝日军高官厚禄的引诱和劝降。

1938年8月，面临国民党第三战区欲收编太湖别动队的压力，钱康民和赵安民冷静分析时势利弊，为使部队免遭不必要的损失，遂同意接受收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挺进队独立支队。10月，日本侵略军大规模扫荡杭嘉湖地区，钱康民、赵安民率独立支队在双林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但钱康民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勇猛异常的无畏精神和行为，却在战士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3月，独立支队余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三战区江南挺进纵队步兵第三团，纵队司令调丘玉林来任团长，钱康民、赵安民仍留团内。因钱对部队管理甚严，且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故而部队军纪作风较好，以致丘玉林检阅三团时，认定团内有共党分子，并联络汉奸部队围攻三团，虽未能得手，但后来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却派了一批政治指导员到团内监视活动，并

将赵安民调送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部队的处境十分险恶。5月，钱康民与中共中央特科派来吴江争取武装抗日的党员丁秉成取得联系。并按照丁秉成的意见，利用机会从团里拉出40多人枪，组建了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钱康民任司令，丁秉成任副司令。他们执行党中央“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率领这支抗日部队 旋于江浙两省交界的吴溇、义皋、大钱一带，袭击日伪，宣传动员民众，仅2个多月，部队就发展到200多人。并与当时已东进到达无锡的新四军“江抗”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江浙太湖义勇军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仇视。1939年8月23日，钱康民、丁秉成率领部队行进到东太湖吴溇附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28军62师优势兵力的袭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钱康民，临危不惧，果断指挥突围。双方激战2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钱康民左肋及前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金丽 整理）

附录:

烈士钱康民传

烈士钱康民，江苏吴江人，先烈涤根先生讳刚之哲嗣也。涤根久客江右，治军旅之学。国民革命军北伐，谋以淞沪响应，事泄，为李宝章所捕，就义龙华。厥后上海市区乃有涤根路为纪念云。康民早孤露，孀慈在堂，仰事俯蓄无所资，则谋以禄　委吏乘田，非其志也。八一三战事起，偕同邑赵安民起兵于吴江之太湖，有程万军者与共事。程性剽狡，视军队为奇货，观望年余，卒弃顺附逆。康民以大义责之，程怒，几不测。既知事不可为，乃只身走浙境，召集旧部，驻兵于吴兴之双林，涟市，善涟诸市集间，一时称塘南义师云。顾程逆恭康民甚，则晋围剿塘南之策于敌伪。康民卒部退塘北因渎邨，整理久之，军复振。忽一夕，得谍报，言敌伪将来犯，即整队向西南行，意谓南方为友军驻札地，必无他虞也。至翌日拂晓，距因渎邨迤南已二十余里。敌军忽起于前，乃迎战。轰击二小时，众寡不敌，康民左肋及前胸俱中弹，与同志丁月槎等七人俱死之。时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康民年三十三。妻某氏，无男子子，有女子子三人云。柳亚子曰：余与涤根同邑，顾初不相识。民十五偕朱季恂侯绍裘游广州，涤根方供职黄埔，曾招余等宴饮，一时胜流咸集。其后余感激时变，退隐沪上，则涤根以殉义闻矣。康民在沪时，亦赏数谒余，顾无力振援之。距八

一三前数月，吴江中山公园为涤根树纪念碑，康民索余撰文，墨渖未乾，倭难遽作。余杜门三载，亡命香岛，乃得见某君所为康被难纪略，爰欤括之如右。康民单丁无昆季，其遗孌下奉孀姑，下抚弱女，厄穷之状，未忍言宣。并世不乏慷慨慕义之士，倘有能慰涤根父子于地下者欤。

柳亚子

（载于 1941 年《光明日报》）

沈文潮、虞仞千

沈文潮（1915—1941），1915 年生于吴江县盛泽镇里安街，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到镇上华记绸厂当学徒，为母分担起抚养弟妹的重担。

1931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年 11 月家乡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残暴地蹂躏了文明、古老的家园，昔日繁华的市容，顷刻满目萧条，一片凄凉。爱国之心驱使着不甘当亡国奴的热血男儿寻求抗日救亡之路。1938 年 6 月，沈文潮的叔父沈立群受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委派，从江西上饶回到吴江，建立沦陷区的县政府，并声称要建立武装游击队，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参加工作。沈文潮怀着抗日的愿望进入了县政府，当司法书记（文书一类的工作）。当时在游击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为避免日伪的骚扰，县政府经常流动，生活极不安定。

在工作中，沈文潮先后接近了打入国民党县政

府的中共上海情报系统的党员沈月箴、肖心正、金大鹏，其中肖和他原是亲戚，四人结为好朋友。他们同吃、同住在农民家里，经常交流对时事形势的看法，肖还借《上海周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给他阅读，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情况，而逐步产生了拥护共产党的理想。当长兄从重庆来信，叫他脱离沦陷区，到后方工作时，他已丢不下这班火热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朋友了。毅然谢绝哥哥的关心，表示不怕危险，在家乡坚持抗日到底，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1940 年八九月间，经沈文潮的一再要求，金大鹏征得上级领导的同意，吸收沈文潮参加情报工作。

此时，沈文潮已担任县政府的总收发和监印官，其妹又当上了电台的译电员，为我党组织收集情报大开了方便之门。参加党的工作以后，沈文潮干劲更足了，凡是抗日的工作，都争着去做：在严墓大庙唱歌、演剧，宣传抗日；机智地闯越道道敌伪检查哨，为“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传送捐款收据；参加武装除奸等等。

1940 年 12 月 12 日，沈文潮得知金大鹏、俞清志（三区区长、进步青年）要除掉安清同盟会盛泽分会长、大汉奸叶冠吾的计划后，自告奋勇一同

前往。傍晚，他们悄悄潜入盛泽镇，隐藏在沈文潮家中，派小弟叫来向导许永寥，一起商量行动方案。尔后化装来到叶宅。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沉寂的夜空，恶贯满盈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次杀叶活动，推动了青年武装抗日的积极性，也使敌伪极为震惊。1941 年 8 月，沈文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虞仞千 (1921—1941)，1921 年 11 月生于嘉兴县新塍镇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经常失业，母亲给人做针线以贴补家用。仞千年少英俊，又是独生子，深得父母宠爱，视若掌上明珠。因家境清贫，初中未毕业就自谋生路，为博一技之长，自学立信会计，后在镇上农民银行办事处当练习生。在发放农贷工作中，深感农民之疾苦。

抗战爆发后，17 岁的虞仞千激于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说服双亲，来到严墓，同当地青年一起投入方兴未艾的抗日救亡洪流。开始在税务所任会计，他正直朴实，沉默寡言，嗜爱读书。认识肖心正等人后，志趣相投，结为好友。1940 年初，肖借口人手不足，调他进县政府当助理会计。于是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肖心正、金大鹏、沈文潮等人，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曾和沈文潮等在严墓大庙演出短剧

《毛维德》深受群众欢迎；盛泽除奸前夜，虞仞千和肖心正通宵印刷传单，为宣传做准备。1940 年 11 月，他又为县政府开办的税务青年训练班教授财会知识，实际是替地下党员的时事政治课打掩护。他与学员同吃大锅菜，同睡统地铺，经常值夜班，以防日军和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表现得非常出色。

虞仞千一心抗日，以国家利益为先，置个人之事于后。他父母年老体弱，多次催他成婚，好了却一件心中大事。他却说服对象，不到抗日胜利，决不结婚。又好言劝慰老人，使他们理解自己的爱国心愿。在学习和工作中，虞仞千在政治上渐趋成熟，他深恶痛绝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对抗日青年的政治压迫，终于向肖心正、金大鹏提出寻找共产党的要求。1940 年 12 月，党组织吸收他参加搜集情报工作，担任密写。他动脑筋，想办法，研究出密写新招——用蜡纸刻写，然后印刷，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1941 年 8 月，虞仞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奉命从广德开赴吴江、青浦一带，执行反共任务。“忠救军”一到严墓就叫喊县政府内有异党活动，形势日趋紧张。四五月，浙西系统在吴江的两个地下党员先后被捕，其一牵连到肖心正。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紧急汇报后，立即布置

金大鹏、肖心正迅速撤离吴江，沈文潮、虞仞千因未暴露身份，继续原地坚持。当时，沈、虞二人感到既孤单，又缺乏经验，但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8月，肖因经手帐目未了事务，自上海返严墓，与沈、虞同住在谨下浜农民家。肖向他们传达了上级对形势的分析，并相互交换了情况。20日，即肖回严墓的第7天清晨，“忠救军”逮捕了原税训班学员袁璋，肖闻讯赶到镇上营救无效。“忠救军”得悉肖的行踪，密谋杀之。傍晚，肖从镇上回农村宿地，途中听到枪声，谨慎地折回镇上一个熟人家投宿。当夜12时左右，“忠救军”便衣多人，突然敲开沈文潮、虞仞千的房门，追逼交出肖心正。沈、虞二人从容不迫地回答：“不知道”。特务翻箱倒筐大肆搜查，一无所获，遂将沈、虞绑架而去，从此杳无音讯。时沈文潮26岁，虞仞千20岁。

解放后，在镇反中获悉沈文潮、虞仞千当夜被敌人用小船押到南浔马腰的桑田，秘密杀害，遗骸已无处寻觅。党和政府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金丽　整理）



王　化　鹏

王化鹏（1916——1941），又名王听涛，1916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东林。他的父亲是县内著名的画家，年青时去上海美专学习，后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宣传工作。北上到济南时，亲眼见到不少革命志士被蒋介石惨杀，颇感失望，离开部队回到了老家。但他带回了不少宣传物品，给家庭带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这使幼小的儿女也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

王化鹏7岁进村办崇兰小学读书，11岁随父亲到县城二戴小学求学。小学毕业考进嵊县中学，中学毕业后到杭州考入社会教育学校。他从小勤奋好学，在中学读书时就喜爱文学，不仅喜读世界名著，而且自己也进行创作。他曾和周丹红及弟弟王梦飞组织过一个文艺团体，取名“飚风社”，并出刊《飚风周刊》。后来又有一些校外的文艺青年参加，其中也有地下党员负责指导，这样使大家得到了阅读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著作的机会，有了共产主义的向往。化鹏酷爱诗人马雅科夫斯基那种音节短

促、节奏鲜明而富有战斗色彩的诗篇，他也学着写这种诗作。在校时，他常有诗作和译文在壁报等校内刊物上发表。同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与印发救亡传单，参加示威游行等。以致在第二学期被校方开除。在返家途中又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以宣传赤化、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坐了6个月的牢。但是反动派的迫害并没有把他吓倒，相反使他更清楚地认定自己该走的路。经保释在家住了半年，又与胞弟王梦飞同赴杭州，进了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攻读体专科，同时学习音乐。

王化鹏进入杭师后，依旧和市里的进步青年保持联系。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侵犯杭州前夕，杭师部分师生由学校组织向浙东撤退，到了浙西建德作短期休整。当时的进步教师王耘庄和张同光号召同学们离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王化鹏兄弟和10多位同学热烈响应，一同离开学校，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们在教师指导下，抄收广播中的抗战消息，从逃难同胞中打听前线战况，出刊《救亡情报》。王化鹏既当记者，奔走于车站码头；又当售报人，叫卖于街头巷尾。他们到浦江，到永康，多方寻找抗日工作岗位。一面如饥似渴地读进步书籍，一面进行自我训练，学习口头宣传本领，向群众作各种抗日宣传工作。王化鹏从容老练，表达能力

强，演讲时有声有色，听者动容。1938 年春，他们又随教师王耘庄到金华，在“浙江省第四游击支队”分别担任各中队的指导员。化鹏在第三大队第七（或第八）中队，他与士兵同吃大锅饭，同睡统地铺，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道理。七八月间，化鹏与同学们仍由老师王耘庄介绍，到永康方岩参加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倡办的省“抗日自卫会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9 月，参加全省县政工队集训总队集训。集训后王化鹏参加了以姚旦为队长的“省政工队第一大队第二队”。10 月，随队出发浙西前线，受命开展对敌“政治进攻”。我党要求同志们在这个旗号下到浙西开辟工作，散播革命种子，开展党的活动。当时，先后编队从方岩出发的各队中，以姚旦队中的党员为最多，化鹏就是其中之一。

王化鹏在浙西敌后先后到过吴兴、桐乡、崇德，任过菱湖工作组组长，州泉工作组副组长。当年的浙西环境非常险恶，斗争尖锐残酷，王化鹏工作得很起劲，还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写诗作文。从 1939 年到 1940 年短短一年间，他写了很多反映战斗生活的短诗。他的诗清新、质朴，充分反映了同志们的如火豪情。登在队刊《突击》半月刊上，流传到浙江、桂林后方和香港文化界，得到好评。

1940 年夏秋，王化鹏，调入吴江县政工队，负责民运工作。不久，苏浙特别支部成立，他任宣传委员。当时吴江县地处敌伪相互勾结的三角地区，政工队所在地严墓（今铜罗）及其周围，既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地方杂牌军，又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和平军，情况非常复杂。要在敌人心脏地带发动群众抗日，组织培训进步青年，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危险性极大，任务十分艰巨。同年10月，化鹏与特支其他同志一起在严墓镇创办了青年"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进步书刊，教唱抗日歌曲，讨论时政，撰写短小精悍之文章，出版油印快报《正义》和《严墓新闻》，在此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了严墓镇党支部，王化鹏任支部书记。此外，化鹏还亲自动手编写《识字课本》，举办"识字班"，谱写抗日歌曲，不但提高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还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得到群众的拥护，从而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达到高潮。吴江县的国民党顽固派趁势向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发起疯狂的进攻。迫于形势变化，组织决定革命力量转入我党控制下的三区，王化鹏任三区部队的指导员。为使三区部队和民运工作扎根于群众之中，化鹏多次深入乡村进行细致的调查，

与广大穷苦农民交朋友。当他了解到盛家埭村的地主、富农对佃农、雇农的盘剥特别苛刻时，便组织大家学习老区实行的“二五减租”的农村政策，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为贫雇农撑腰，使地主、富农不得不按“二五减租”的规定办事。又如，他了解到某哑巴家的童养媳受婆婆虐待，便会同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去哑巴家做工作，支持这位童养媳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王化鹏还非常重视争取统战对象，耐心教育当地的乡长和保、甲长为抗日工作出力。如大谢乡庄浜的保长，年纪轻、稍有文化、倾向抗日，他就布置两位进步青年与他结交，晓以大义，结果使这个保长自告奋勇做“联村会”的串联工作。还常常为我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遇到敌情则通风报信，安排隐蔽场所。后来，当我党力量被迫撤离三区时，也是他用化名弄来“良民证”，使同志们顺利通过碉堡林立的敌战区。

1941 年 5 月，王化鹏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工作。当他离开三区驻地，准备通过新塍转达解放区时，突然遭遇到鬼子“清乡”部队的搜索，不幸被捕，解至吴江敌宪兵队，经受酷刑，坚不吐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品质。后惨遭杀害，时年25 岁。

（金丽　整理）

陈 有 民

陈有民（1922—1941），又名陈子耘，1922年生于吴江县铜罗镇，1939年，参加由中共中央特科地下党员丁秉成任指导员的国民党吴江县政工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同年8月，因丁不幸牺牲，大部分随丁来吴江的党员、青年奉命转入昆山“联抗”。1940年初，18岁的陈有民追随革命也来到昆山“联抗”。在这里他得到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培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5月，昆山“联抗”整编为江抗第三支队第一中队。6月17日，在大风湾与日军遭遇战中，陈有民带伤作战，英勇顽强，得到党支部领导的赞赏，此后担任班长。10月底，四支队收编了地方武装石渊如部队，陈有民调往石部任指导员。1941年3月，新四军成立六师十八旅，陈有民任五十二团二营四连指导员。日伪清乡时，二营转移到铁路以南，苏锡太湖一带打击牵制敌人，由此归入十六旅建制。1941年11月，陈

有民在杨树园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2岁。

（金丽　整理）

顾　葆　恒

顾葆恒（1916—1942），又名戈白章，吴江县同里镇富干街人，1916 年出生于一个教员家庭。他生性聪颖，极富正义感。7 岁上同里镇丽则小学，12 岁毕业。尔后，到苏州高师就读，于 1934 年毕业。时值其父辞世，于是他回到家乡同里，接父班在东溪小学执教。1936 年，在亲戚的帮助、支持下，考上苏州东吴大学。一年后，转考入复旦大学。抗战爆发后停学，回同里参加“抗日后援会”，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7 年秋，上海被日军攻陷。此时，顾葆恒与同里镇王天基、王锦帆等三人商量后决定离家去延安参加抗日武装，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一路北上到汉口，经人介绍至八路军驻汉中办事处。该处领导人李涛安排他们去新四军。当时新四军刚组编，缺少政工人员，顾葆恒三人被介绍至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在该队政治部所属服务团搞宣传工作。其时，顾葆恒改名戈白章。



1938年，部队到达南昌，顾葆恒遇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不久就调到一支队政治部下属的服务团做宣传工作，一直战斗在司令员的身旁。当时，支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原服务团的大部分同志集中到支队战地服务团，顾葆恒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1940年顾葆恒调到支队政治部工作，任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此期间，顾葆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他还曾回皖南老一团工作了一段时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顾葆恒随三支队五团副团长江渭清等同志一起经过8天8夜苦战，终于突出重围。新四军把原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改建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顾葆恒于1941年3月到1941年10月在该旅政治部任组织科长。在此工作期间，顾办事认真，工作积极负责，作风正派，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8月，部队转移到苏北靖江一带，顾开始患痢疾，病势严重，组织上专门派医生、护士照料他，但他仍不肯休息，坚持工作。期间，部队不断向江都、高邮、宝应地区战略转移，旅部首长考虑到顾的身体状况，让他改任宣传科长。1941年底到1942年初，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但尚未痊愈，就又到军部工作去了。本来身体有病的顾葆恒，加上拼命工作，再次病发，

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42年7月在阜宁病故，终年26岁。

（沈建国整理）

俞　清　志

俞清志（1917—1943），1917年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溪家滩。早年丧父，其母靠帮人家做些零活养家糊口，度日艰难。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3岁的小清志已经懂得谋求生路，自己养活自己了。但在当时的社会里，当学徒也要一笔拜师钱，这对衣食不周的清志来说谈何容易。没有办法，他只好离开家乡去当兵。到部队后，没有文化的清志，渴望得到知识，他刻苦自学，后来竟当上了小文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第三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受训，1938年初毕业分配，随新上任的县长沈立群从江西上饶来到沦陷区吴江县，重建国民党县政府。

当时的吴江县，城区、平望、盛泽、震泽等主要大镇和交通要道均有日伪据点，只有河港交错、交通不便的严墓（今铜罗）一带日伪军来往较少，因此大部分士绅纷纷避难于此。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的党政要员早已弃职不顾，逃往后方。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流落吴江的散兵游勇及地方武装，各占地域，自称抗日游击队。“抗日”司令多如牛毛。

沈立群身为县长，却是个“光杆司令”，他一无枪支，二无权势，只能在各种力量的缝隙中周旋活动。经过惨淡经营，国民党吴江县政府于1938年9月在严墓章奥村宣告成立。俞清志任特务中队的政治教官。不久，又担任了县常备中队队长。他以一颗报国之心，加紧军事训练，准备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然而，身为县长的沈立群，一心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县长的宝座。他一方面向上输送兵力、财力；一方面搞生意买卖，图谋私利，竭力回避与敌交战。他的这种不良行为，激起了清志和广大爱国青年的强烈不满。

此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情报组织，派出党员丁秉成等及党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员20多人，来到吴江，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县政府、县常备队和政工队。他们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争取和转化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各项抗日工作。他们纯真、赤诚的爱国之心和艰苦朴实的生活作风，与国民党军队的荒淫无耻、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犹如一股春风吹入清志的心田，使他看到了希望。俞清志常常听中共党员沈月箴、金大鹏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参加他们组织召开的抗日座谈会，阅读进步书刊，与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

1940年初，原三区区长被日军杀害后，地下党组织利用沈立群安插培植亲信的意图，由沈立群的妻弟、中共党员肖心正出面，推荐俞清志当区长，打算把三区发展成一个抗日活动基点。此举虽遭到县政府内一班争权者的非议，但因俞清志是县长沈立群从上饶带来的唯一青年军事骨干，最后还是决定委任俞清志为三区区长，兼三区抗敌自卫区大队长。三四月间，俞清志带着30多名从县政府常备队中挑选出来的精壮战士，组成三区自卫队，并配备了特务长、文书及两名区助理员，走马上任。当时三区辖有6个乡，离开敌占区重镇盛泽不到5公里，中间只隔开一个宽阔的西白漾。乡间常有小股敌人前来骚扰，一些乡保长与盛泽镇的伪组织相互勾结，催收军粮，农民的恐日心理比较严重，情况十分复杂。

俞清志上任以后，积极革新区政，不准乡、保长为日伪军征粮，违者作汉奸论处。并建立了情报线，掌握日伪动态，收到良好效果。1940年6月，俞清志得到日伪将袭扰三区的情报后，将部队悄悄拉到茅塔乡，3个班的兵力分散潜伏在桑林屋群之间。傍晚，敌人的汽艇在圣塘港靠岸，当50多个日伪军神气活现地走上大溪桥时，清志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发，日伪慌乱后退，盲目滥射，枪声一

夜不绝。而俞清志早已带着部队安全地回宿营地了。第二天傍晚，又捕获了盛泽派来刺探军情的汉奸曹永生，经上级批准，就地枪决。由此极大地鼓舞了队员的抗日信心，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护，开创了三区的新局面。

此后，俞清志先后接纳了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三区，开展民运工作。他们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组织群众办夜校，讲解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宣传老区实行的“二五减租”政策，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迫使地主、富农同意减租。

俞清志任区长的三区为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了基点，而地下党组织则将三区的抗日形势推向高潮。

俞清志革新区政的行动与原有旧势力发生了矛盾，他为了有力打击汉奸的气焰，排除旧势力的干扰，使三区走出一条抗日的路子，决定除掉以青帮流氓为骨干的汉奸组织“安清同盟会盛泽分会”会长叶冠吾。地下党的同志为推动俞清志坚持抗日，为了把三区工作抓起来，也大力支持他杀叶。1940年12月12日下午，俞清志、金大鹏等4人潜入盛泽。夜7时许，来到毛家弄叶宅观察情况。约10时，只见颈后生个瘤的叶冠吾从家里出来，不一会端着两碗馄饨回去，清志等人迅速跟上，两人守



门，两人上楼，对叶各开一枪，将叶当场击毙。从进门到脱离现场，前后不过一分钟。杀叶之举在青年中产生强烈影响，连从来不拿枪的人也要求亲自杀敌。1941 年 1 月，县政府办事员朱见华单独潜入盛泽，在闹市举枪向日军伍长射击。2 月，俞清志又带着 3 名战士到盛泽，从容踏进伪区公所，当众击毙区长简汉青。在日军严守的据点中，接连发生日伪汉奸被杀事件，使敌人惊恐不安，县政府内的青年为此受到鼓舞。常备中队长张贻翼在日军扫荡逼近时，不顾敌众我寡，握一挺机枪迎敌阻击，掩护大家转移。尔后，又带了六七个青年去梅埝车站，伏击日军车辆，取得了胜利战果。日伪对俞清志恨之入骨，悬赏大洋 2000 元捕捉他。

清志在三区中有较高威信。他沉着勇敢，有胆有略，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夏天青布衫，冬天老棉袄”，清茶淡饭豆腐汤，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深得大家的信赖。他对部属爱护备至，亲如兄弟。机枪手是平底足，行军负重有困难，清志为他配备了副射手和弹匣手，行军时不让他掮机枪。战士生病了，他用自己的钱为病员改善伙食。但是对触犯纪律，危害民众的事则严惩不贷。有个战士强奸民女，有个班长抽鸦片，敲农民竹杠，还妄图拉部队投伪，清志核准事实后，处予枪决。

1941 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吴江。三四月间，大批“忠救军”涌入吴江，四处布设暗哨，搜捕共产党人，日伪军也频频扫荡，形势发生逆转。俞清志冒着风险又接收了从县党部青工队撤出的一批共产党员，让他们分别担任区大队副、区指导员、区分队长、各乡事务员和干事，继续开展工作。不久，形势恶化，这批党员和部分青年骨干陆续离开吴江。俞清志决定筹借一些钱，到广德去开设文具店。然而“忠救军”的魔爪已经向他伸出。

1943 年 1 月，“忠救军”嘉兴站接到总部密电，限其在 24 小时内处决俞清志，不得有误。密杀令交到常驻坛丘的李振琪手中。他获悉俞清志将亲自携带三区田亩交捐的钱款，由武装班护送去后方解交沈立群（因日伪大清乡，国民党县政府撤去安徽宁国县）。但形势紧张，俞不打算去了。于是李振琪串通三区助理沈峙山，鼓动俞去后方。10 日上午，沈邀俞坐船去严墓，李振琪集合全组人员，在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并派人做眼线，从坛丘一直跟踪到严墓。船一靠岸，沈峙山就借故走开，俞清志走到西汇街上时，遭到突然袭击，中弹牺牲。时年 27 岁。解放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金丽　整理）

倪　淑　英

倪淑英（1916—1943），又名宋维，吴江县松陵镇人，1916年生。她曾在松陵镇城西女子小学和同里镇女子小学读书。1928年8月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该校学习六年，毕业后，先后在吴县县立新阆小学和上海市中振小学任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满怀爱国激情的倪淑英从上海回到吴江，立即组织回乡过暑假的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她自己带头走上街头，和同伴们一起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对上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淞沪杭战役开始。这时，倪淑英已经无法返回上海。她留在吴江积极从事抗日后援工作，主动为前线撤退下来的伤病员服务。这一年9月，倪淑英来到吴江县西南部的严墓区钮家汇小学任校长。在教书之余，她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大家起来抗日。不久，局势更加恶化，苏

州、吴江即将沦陷。11 月，倪淑英与全家一起跟着逃难的人群向浙江山区撤退，经杭州、江山，于年底到达湖南长沙。

到长沙后，倪淑英曾到长沙难民收容所帮助工作。在那里，她接触到一些革命同志，经常听他们分析战争形势，讨论抗日工作。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他们决定到抗日前线去。1938 年 2 月春节前夕，倪淑英和其他几个同志离开长沙，北上汉口，找到了原苏州女师的老师罗琼同志（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同年三四月间，经罗琼介绍，她取道西安，到达延安。

倪淑英在延安先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时，她同张国坚同志相识并结了婚。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陕西省枸邑县织田镇工作。不久她和张国坚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秘书副主任、机要秘书和晋察冀公安局的秘书主任。她还是机关的党支部委员，平时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她当年的警卫员杨志毅同志回忆说:“淑英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上艰苦朴素，而且特别能吃苦。对同志，她有股火一般的热情，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我 1939 年参军时才 13 岁，没有什么文化，她就给我找来钢笔和本

子，教我写字、读书，学文化。冬天，我有时晚上睡觉没被子，淑英同志就常拿她的大衣给我盖。”1940年底，倪淑英在机关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3年秋季，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一场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大扫荡。我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反扫荡斗争，长达两个多月。倪淑英的爱人张国坚当时担任冀中公安局局长，工作非常紧张，而倪淑英正怀孕，不能随他一起跟着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她参加分散的战斗小组活动。她所在的战斗小组共有9位同志，他们坚持在阜平、涞源两县交界的山区活动。开始时，小组里有2匹骡子，但山路崎岖陡峭，骡子不顶用，只得靠步行爬山。当时倪淑英同志拖着沉重的身子，行动困难，但她一声不吭，坚持跟上队伍。

倪淑英对这场反扫荡斗争的残酷性早有思想准备，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在斗争中她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安全。1943年9月中旬，倪淑英所在的战斗小组爬上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神仙山最高峰，在神仙山一带转了十多天。当时，她的警卫员杨志毅同志正好患疟疾、发高烧，躺在山上走不动，行军要靠其他同志背，而据点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情况十分紧急。杨志毅要求战斗小组不要管他，赶快转移，倪淑英坚决不同意。在他病得最厉害的时

候，倪淑英把最后两支退热针给他注射，使他转危为安。

10月13日凌晨三四点钟，倪淑英和她的战友们宿营在涞源县桦木沟村东头路北的一个大院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敌人来了！同志们当即决定向后山突围。他们翻过院墙，到了后山，又往高处爬一阵，回头向下一看，只见一大片头戴钢盔的敌人正在向他们包围过来。这时，后山已经没路可跑，倪淑英同志一面销毁随身携带的文件和日记，一面奋不顾身地向敌人投手榴弹。然后改道往西，走了二三里地，来到一条干河沟边，顺沟又爬到西头的小山坡上，敌人越来越近了。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倪淑英的手，顿时鲜血直流。杨志毅同志赶紧帮她包扎了伤口，离开敌人只有十几米远。小组的另一位同志起来，要杨志毅留下掩护，他搀扶倪淑英撤退。当时已是清晨五六点钟，天亮了，目标越来越暴露。在这紧急关头，倪淑英却要杨志毅赶快走，要他脱身后给机关报个信。杨志毅不肯一个人撤走，倪淑英说："我命令你走！"并且用力把杨一推，杨志毅滚下了山坡。

杨志毅离开后，倪淑英和其他3个同志隐蔽在一块巨石之下，准备作最后的战斗。她把一直带在身边的张国坚的照片咬在嘴里，把一个个手榴弹扔

向哇哇嚎叫着围上来的敌人，很快十几个日本鬼子倒在阵地前。由于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倪淑英等4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倪淑英身中8弹，时年27岁。

反扫荡斗争结束，部队在河北省阜平县石家寨为倪淑英同志开了追悼会。1956年，苏州市民政局给倪淑英烈士家属签发了烈士纪念证。

（沈恩得整理）

张 梓 楠

张梓楠（1916—1944）1916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家境清贫，父亲以绸领业为生，母亲以调丝贴补家用，才勉强度日。张梓楠幼年时在绸业小学读书，为人爽朗乐观，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我东北三省，尚在读小学的张梓楠满怀爱国热情，痛恨侵略军暴行，常跟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反对日军侵略。

小学毕业后，张梓楠在震泽中学读了两年书。18岁那年到上海华洋西药房（上海二马路大新街口）做练习生，工作认真踏实，刻苦钻研业务，1936年晋升为药剂师。

抗战爆发后，抗日根据地药物奇缺，新四军不时派人到华洋西药房采购西药品。张梓楠逐渐跟新四军有了接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进一步激发了抗日爱国的热情。1939年，张梓楠放弃了较好的生活条件，投奔革命，参加新四军。临行前，资

方曾以名利地位为诱饵，劝他别离开，但他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参加新四军后，在卫生部任药剂师，随部队辗转于苏北和安徽地区。一次，他率领部队运输军火、药物，碰上了敌舰巡逻，他临危不乱、机智沉着，指挥36条运输船巧妙地躲进了港汊的芦苇荡中，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冲突，保存了部队战斗需要的军火和药品。

1942年冬天，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大雪纷飞，道路难以辨认。张梓楠和战士们一起骑马疾驰，执行任务，奔上一座被厚雪覆盖的旧木桥，因马蹄踏空，连人带马一起跌下了桥，摔断脊椎骨。他立即被送往部队医院抢救。因战时医疗设备差，一个月后，转送上海治疗。当时，日军已占领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和新四军，张梓楠无法住院，只得回盛泽家中养伤。养伤期间，他严密隐蔽自己的身份，谨防日伪军的搜查和盘问。在床上，他日夜怀念着部队和战友，迫切希望早日康复，重返沙场，为革命再作贡献。但终因病情严重，于1944年去世，年仅27岁。

1965年，盛泽镇人民政府在目澜洲公园为张梓楠建造了烈士墓。

(沈建国整理)

姚 之 英

姚之英（1921—1944），小名魁元，又名姚达，1920年生。幼时随教私塾的祖父就学，后到严墓（今铜罗）镇父亲开设的中药店做事。他是家中的长子，又是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希望他子承父业，做一个循规蹈矩、自食其力的人。之英遵照父亲的教诲，刻苦钻研中药业务。他待人和气、礼貌，深得长辈和同龄人的喜欢。

1937年11月，家乡沦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民族的危亡激起了姚之英的爱国热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再也无心安分地从商，而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在工作中，姚之英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化鹏、陈友群，十分钦佩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姚之英参加了“青年读书会”，阅读了《论持久战》、《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革命书籍，从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1940年11月，姚之英经王化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并担任支部青年委员。他家的药店变成了我党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党的支部大会常在这里秘密举行，严墓镇支部的活动计划也常在这里议决产生。姚之英还利用自己的职业掩护，组织了一批要求上进的青年阅读革命书籍，学习革命理论，教唱革命歌曲，以激励革命斗志，提高思想认识。

姚之英在自己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还鼓励妹妹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 年初，他鼓励妹妹参加了由中共党组织参与创办的税训班的学习，这年端午节又送妹妹投奔了新四军，并多次给妹妹写信勉励她坚定革命信念，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吴江县严墓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此时，姚之英离开新婚的妻子，由党组织派往三区盛泽工作，公开身份是区公所助理员。1941 年 12 月，由于中共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和中共党员蔡允中（公开身份是三区区中队指导员）被“忠救军”追捕而撤离，姚之英也一起撤往苏西游击区。后奉派去宜兴县委工作，任我方乡长。1942 年夏，由于敌人大扫荡，外来同志难于隐蔽，姚之英又调往锡南县委，任组织部干事。

当时的锡南环境非常险恶，它紧靠日伪大本营

无锡城，是敌我争夺的要地。1942 年春，锡南被日伪划为重点清乡区，沿太湖筑起篱笆墙，进行梳篦式扫荡。而我地下党组织不畏艰险，以顽强、忘我的精神，秘密建立游击队，恢复党的工作。姚之英与县委组织部长张文龙一起，在葛埭桥镇以开小店为掩护，开展工作。1943 年上半年，形势趋于好转，我党在锡南地区建立了三个区委，姚之英任新安区区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公开的政权—锡南办事处，并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锡南抗日防卫团”，姚之英兼新安区抗日防卫队大队长。这时姚之英的工作已半公开化，他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积极、热情地四处奔波，穿梭于新安区各乡和新四军锡南太湖游击队之间，指导训练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每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之后，姚之英总要挤出时间教通讯员吴锡良识字，谆谆告诫他“要革命就要学习文化，有了文化，对革命道理就懂得多一点”。姚之英性格随和，待人诚恳，与群众情同手足，因此工作开展很快。

1944 年 3 月 3 日，姚之英参加县委会议结束，一早带着通讯员小吴赶往周巷参加党支部会。当两人走到吴泥湾村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两名便衣日军，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日军两支枪逼着姚之英。在这危急时刻，姚之英把手中的公文包丢给小

吴，然后一个箭步向前用双手紧紧抓住敌人的两支枪，大声对小吴说:“快跑!”。不料后面赶来大批日军，将他们团团围住。日军欺侮小吴人小，拷打逼问他联络站在哪里？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姚之英见状，立刻说:“这小人是我在途中抓来带路的，不是新四军，你们放了他。我是新四军，有什么事问我好了。”日军将信将疑，把姚、吴两人一起押往小溪桥据点。当晚，吴锡良在被审问中，也坚持说自己是被抓来带路的，其他一概不知道。日军信以为真，就将他放了出来。姚之英被押往周新镇日军据点，党组织曾设法营救，终因敌人戒备森严而未成功。

姚之英虽身陷囹圄，但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这天夜里，姚之英被押出牢房，他立即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奋力争脱敌人的魔掌，从一日军身上抢下一把刺刀，拚命向敌人戳去，后遭敌人乱刀捅死，时年24岁。

（金丽　整理）

费　巩

1946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代表我党向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要求，其中第七项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中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这里所说的费巩，就是吴江籍的著名浙江大学教授，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为了追求科学和民主，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因此惨遭杀害，甚至毁尸灭迹。我党把费巩同叶挺、廖承志等并列在一起，充分说明了这位无党派人士的英勇的斗争业绩和他的生命的价值。

好学上进的青年

费巩（1905—1945），原名费福熊，字寒铁，后字香曾，吴江县同里镇人，1905年生。其父亲费树蔚，字仲深，又号韦斋，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苏州最有名望的文人之一。辛亥革命后曾入幕府，为肃政厅肃政史。后帝制议起，袁世凯想当皇帝，费仲

深认为危及国本，虽与袁家有亲戚关系（费仲深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连襟），却直言极谏。因不被采纳，即拂袖而归，退隐苏州。费巩有兄妹4人，兄福焘，妹令宜，弟福煦。柳亚子先生，是费仲深先生的外甥，费巩的表兄。柳亚子的外公延庆与费巩的祖父延鏊是亲兄弟。

费巩自小受到严格的教育。他7岁起在苏州小学，13岁时与哥哥福焘一起到上海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并于1923年（19岁）考入复旦大学。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学习善于提纲挈领，临考处之泰然。费巩进复旦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文学，后来复旦增设社会科学科，他就改学社会科学专业。

费巩秉性耿直，且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同学们尊称他为“费公”。1924年，复旦学生自治会推举费巩为学生会评议委员会主席。他受任后，支持和倡仪学生自治会办壁报、校刊，办义务学校，认为学生可以议论国家大事，不应受任何限制。后来，学生自治会又推举他为义务学校董事长。当时义务学校的学生，都是江湾地区一些贫民子弟，他们没有钱进上海的教会学校和设备好的学校读书。费巩虽然自己有繁重的大学功课和其他社会活动，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来履行义务学校董事长的

责任，使学生的学业和思想在费巩指导下进步很快。1925 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费巩发动全校教师和学生在江湾一带演讲、贴标语、游行示威，有力地配合全市商店、工厂、学校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

费巩的性格既老成持重，又很风趣活跃，还十分喜爱体育活动。他当过班级的足球队管理和田径队队长。直到今天，他当年的同学仍旧能清晰地回忆起费巩在运动场上的英姿。

费巩于 1925 年冬在苏州完婚。夫人袁慧泉女士，原名袁家第，是袁克定的女儿。当时，费巩正上大学三年级。1926 年 6 月，费巩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政治学系。

1928 年秋天，费巩经过两年自学外语的准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自费出国留学。他先到法国，后转到英国考入著名的牛津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在国外，费巩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在学业上发愤用功。他除了学好专业课程外，还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详细地抄摘笔记，搜集各种有用的资料。就这样，经过近千个日日夜夜，费巩带着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科荣誉毕业生的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朦胧的向往，取道苏联回国。

这时候的祖国每况愈下。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进攻。蒋介石政府由于集中精力打内战，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以至日本侵略者在短短的2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使东北3000万同胞、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抱着改革中国腐朽政治的愿望踌躇满志归来的费巩，听到这丧权辱国的消息，心里无比沉重。他从海参崴到天津的航途中，看到海面上横行的尽是日本的船只，为表示自己的愤慨和砺志，他把自己身穿的西装抛进了大海。

深孚众望的良师

凭学识、才干及社会关系，费巩回国后完全可以在政界、经济界、法学界任职，他的大哥和亲戚也为他在上海政界和经济界找到了职位，但他坚决不愿做国民党的官。他决心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献身教育。费巩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后经陈望道先生介绍，在中国公学任教。这一时期，他在上海还结识了邹韬奋，常为《生活周刊》撰文，并主编《复旦同学会会刊》一年。1932年秋天，费巩进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国的政治制度。到1933年秋季，他正式应聘到浙江大学

任教。

在浙大，费巩除了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外，还担任了两年注册课主任。在这时期内，他大力整顿学校教学秩序，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在教学行政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35 年夏天，反动校长郭任远以成绩不及格为理由，要开除包括胡乔木同志在内的10 多名进步学生。费巩是注册课主任，知道学生的分数，他坚决不赞成，与郭任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向外揭露了郭等篡改学生考试成绩的内幕。最后，郭任远还是一意孤行，仍旧开除了胡乔木等进步学生，但费巩主持正义、刚直不阿的品格，获得了广大学生的敬重。1935 年12 月，浙大学生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上街游行，进而开展了“驱郭斗争”。1936 年1 月，蒋介石被迫亲至浙大“安抚”。浙大学生仍坚持罢课30 多天，终于驱逐了郭任远，由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继任浙大校长。在这场斗争中，费巩坚持正义立场，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浙大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其间经浙、赣、粤、湘、桂五省，历程2000 余公里。迁校途中种种艰难困苦，固然使浙大师生经受了锻炼，但是长期迁徙不定，加上学校极端简陋，确实给学校带来了许

多新问题。学校到达广西宜山以后，费巩经过一段时间体察研究，给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写了一个长篇奏议，就学校中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放宽贷金和推行工读以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改革学校的行政管理问题，等等。费巩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当时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推行的导师制，并且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他在《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一文中指出:“今日吾国新式教育之为世诟病者约有三端: 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传授，讲解叙述而外，甚少质疑问难，是灌输知识，而非启发思想……; 二曰师生关系太疏……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交易而退，缘尽于此……; 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教师只管学生学业成绩，品行思想如何，多不加以问闻……。”又指出: 导师培养学生,“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 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因此当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语语自肺腑流出”。费巩这许多旨在改进教学，培育人才的真知灼见，在同事和同学中深得人心。由于费巩教授教学

宗旨正确，讲课内容丰富，方法也很有特色，学生都爱听他讲课。不少学生选他做导师，多时一期竟达50多人。一些理工学院的进步学生，也跨院选他为导师。许多学生常在晚上到教师宿舍找费老师，谈学习、谈生活、也谈政治。这是费巩教授忙碌一天之后最高兴的时候。他同学生亲切地促膝谈心，既作学术上的启迪，又告以种种做人的道理。日久天长，费巩就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感情。学生每有思想问题都来找他商量。许多学生毕业离校后仍与费巩保持书信往来，凡有重大事情，都来信征询费老师的意见。费巩成为当时浙大深孚众望的著名教授。

1940年7月，浙大学生把极其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竺可桢校长“三顾茅庐”请费巩教授出任。不少朋友、同事和学生会的代表都热切地盼望他出任。费巩的思想很矛盾。因为当时学校情况十分复杂，出来做事，不仅会耗费大量的精力，而且要冒风险。但是，他考虑到为学生解除痛苦，为国家培养人才，决定以不参加国民党和不领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同意就职。

费巩在担任训导长期间，除了切实推行并改进导师制外，还千方百计地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的物质条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他是良师，又是慈

母。当时学生晚上点的是一种当地产的劣质植物油油灯，光线很暗，而且浓烟直冒。费巩晚上常到学生宿舍中去，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很不安。于是，这位贵胄出身的教授开始在自己的房子里敲敲打打，研究油灯的改革，经试用成功后，他又以自己节省下来的薪水，亲自到洋铁铺里先后定做了800多盏，分送到各学生宿舍。费巩担任训导长不久，为了尽可能改善一些学生的住宿条件，暑假期间他亲自动手检漏、开天窗、补楼板、杀臭虫，使学生在开学后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费巩教授还十分关心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常常自己出钱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费巩为了学校，为了学生，确实是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地步。

科学与民主

费巩一生追求科学与民主，矢志不移。

1931年9月，费巩的重要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出版。他在这本书中评价了英国文职官员的编制、职权、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实行的具体办法，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国家官吏应是人民的仆人。他说：“人民视民仆为政府佣人，亦为职业之一，未尝异于服务于工商各业，有何显耀尊荣

可言。号为民仆，是民之仆，并不以官吏目之也。”他在此书的结论中进而提出这样的看法:“民仆在国人视之如仆，而自视亦为国之公仆，不以享高位食厚禄而骄傲自大，至于蔑视小民也”,“为政不在多言，而能力行”。1932 年和 1933 年，费巩又连续出版了《英国政治组织》和《比较宪法》等著作。其中《比较宪法》一书共 23 万字，列为“世界法学丛书”。费巩在这本书中除对英美和西欧各国的宪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外，还抨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制，主张以分析比较和批评借鉴的态度学习外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在蒋介石独裁统治时期，费巩的这些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大胆批评国内的政治现状，并提出改革的主张，充分说明了费巩的胆识和爱国精神。

在学校里，费巩教授提倡民主空气，支持言论自由。在他支持和倡议学生会举办的《生活壁报》上，同学们可以自由发表各种议论，可以批评校方和反动当局，而不受任何检查和限制。他严厉主张清除以监视进步学生为职业的特务学生，并规定学生会的壁报编辑绝对不准泄露作者姓名。这个规定，使浙大的进步势力紧紧掌握了《生活壁报》，使之成为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费巩坚决反对国民党党棍和不学无术的三青团学生在学校

横行不法。他把三青团的牌子从训导处办公室的前门挂到后门。三青团举行时事座谈，他坚决不参加。一次在路上，校三青团一个反动头头要求和费巩长谈一次，费巩看透了他的邪恶动机，严肃地说:“我同你没有什么话要谈。”当时，一个国民党的元老曾推荐费巩为复旦大学校长，提出只要他做个挂名的国民党员，可不参加党务活动。费巩坚决不干。他先后4次拒绝加入国民党。

费巩教授的政治主张和高尚品格很快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恐和忌恨。费巩任训导长仅仅半年，就被国民党教育部以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的罪名，胁迫去职。这半年的实践，使他进一步明白：在反动派掌握着政权和武装的状况下，单凭善良的愿望，正气不容易得到伸张。于是，他更加坚定地站在革命和正义的立场上，自觉地投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这是费巩的座右铭。他不顾自己身处逆境，仍然见义勇为，敢说敢做。

1941年初，正当蒋介石挥舞屠刀，妄图消灭皖南地区新四军的严重关头，反动派对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的镇压也空前加剧。费巩非常关心进步学生的安全。有一次，遵义警备司令部突然向浙大校方递

送一份公文，说外地的共产党潜来遵义，躲进了浙大，要在当天夜里清查户口，捉拿“逃犯”。费巩教授闻讯后，一面与竺校长商量对策，一面迅速派人转告几位已经暴露的进步学生。晚上，他把这几位学生安排在自己的房间里住宿，还主动地将自己穿的一件中式皮袍和一双黑皮鞋借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仪容、服装方面加以改妆。不久，在费巩的掩护下，这几位进步学生安全离开遵义，投奔了新四军。以后，费巩教授还多次冒着危险，挺身保护进步学生。这些被营救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

1943 年春，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共产主义，叫嚣要在两年之内决定中国之命运，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在国统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更加腐败。费巩教授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特务统治极端憎恨，他置个人的安危于度外，锋芒毕露地公开发表讲演和撰写文稿，抨击朝政。从 1944 年 2 月开始，费巩连续写了《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吾国固有政制与民主政治》等 3 篇评论宪政的文章，还写了《王之反对党》、《政治风气之转移》等文，分别在《宪政》、《东方杂

志》、《民宪》、《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分析、研究了英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的所谓宪政的反动实质。尽管当时费巩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宣传也是不全面的，但是他对国民党封建独裁统治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在当时的国统区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

费巩还利用学校的纪念周（当时白区学校，每星期一上午第四节课是所谓纪念周）公开讲演。有一次，校训导委员会安排宪政讨论会演讲时，费巩表示愿意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有些人认为可能惹祸，劝他修改讲稿内容。费巩说："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过了两个星期，他还是照所备讲稿登台演讲。他在1944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耀德（指同事杨耀德教授）谓余不肯作违心之论，因而宪政讨论会中未作演讲，极表赞同，谓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

知识分子的光荣

费巩的仗义执言以及他的种种正义行动触痛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神经，罪恶的黑手不久就伸向了这位正直爱国、清白无辜的教授。

早在1943年，军统特务遵义工作组和国民党遵义县党部就曾召开了预谋逮捕和暗杀费巩教授的特别会议，后因慑于费巩的声望，恐轻举妄动会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而迟迟未予执行；但费巩的一切行动却始终处于军统和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

1945年初，经伪教育部同意，费巩教授决定休假，并应邀去当时移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授"民主与法制"。1月27日，他到了重庆，住在胞兄费福焘先生所在的中央机器厂驻渝办事处，计划先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作一番调查考察，以充实去复旦讲授的内容。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部署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根据党的指示，重庆的文化界人士以郭沫若同志为首起草了《对时局进言》，准备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费巩从一个原浙大学生那里看到未正式发表的《进言》传单，感到这个《进言》说得很痛快，很切时弊。他欣然在《进言》上签了字。这篇《进言》一发表，引起很大的震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特务们奉命对在《进言》上签名的人进行各种威胁、恐吓、引诱。有极个别几个人在国

民党特务的压力下，曾被迫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并未参加”。费巩教授对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极为气愤，再次发表文章，痛斥那些人是“怕死鬼”和“小丑”。

1945年3月5日凌晨，费巩在原浙大学生邵全声陪伴下，来到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乘轮船去北碚。邵全声让费老师在码头稍候，自己到附近仓库拿寄存的行李。就在这时，先由一特务将费巩骗离码头，然后早已隐伏在千厮门码头的一群魔鬼蜂拥而上，死拖活拉地把费巩推上囚车，疾驶而去。就这样，轰动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费巩失踪案件”发生了。

费巩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费巩的亲友、同事、学生及重庆各界都密切关注着费巩的生命安危。复旦和浙大的学生会分别召开了以营救费巩为主题的紧急会议，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并且以罢课来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在重庆的40多位留美教授也联名上书在华美军头目魏德迈，呼吁他出面营救。费巩的表兄柳亚子先生与黄炎培先生等一起，也在国民参政会为营救费巩而努力。

我党始终关怀着费巩教授。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知道费巩失踪的消息后，一开始为了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决定暂时不公开此事，而是加紧探查他的下落。当时，费巩胞兄费福焘先生为营

救费巩到处奔走，他的小汽车后面常常有中共南方局秘密派出的车子暗中保护。后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专门发表文章和社论，对此事进行揭露。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与反动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这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教授。

费巩在千厮门码头“失踪”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而后即被关进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特别监狱。在狱中，费巩天天痛骂国民党，骂声一直传到牢外。特务们对他软硬兼施，施以灭绝人性的毒刑，也无济于事。最后，特务们根据密令，残酷地杀害了费巩教授。渣滓洞看守所附近有一个“化学池”，里面注满了猛烈的硝镪水。反动派做贼心虚，为了毁尸灭迹，费巩被害后，敌人竟惨绝人寰地将其尸身丢入硝镪水池里“化”掉了。

费巩教授壮烈牺牲已经40多年了。当年他为之毕生奋斗并献身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今天，我们在深切怀念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教授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他那种光明磊落、追求真理、顽强奋斗、开拓进取的革命精神，让费巩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去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沈恩得整理）

附:　继承遗志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那时，我虽年小，但不会忘记，宣告胜利的那天晚上，全家欢聚一堂，共叙八年的艰难、同享胜利的欢欣，而更大的喜悦是能见到亲人的归来。老祖母眉开眼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就要回来了，一家人就要团圆了”。妈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兄妹三人翘首以望，盼着能马上见到亲爱的爸爸，一家人的心里激荡着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父亲原是浙江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浙大内迁。当时家中困难不少，祖母年老，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拖着三个儿女从家乡逃难到上海，一家老小都需要父亲照应。老祖母和母亲劝阻着父亲，好心的亲友们也劝慰着，有的介绍他经商，有的介绍他当官，但都被父亲一一谢绝了。父亲对家人说:“国难当头，没有国就没有家，青年学生们正在等着我前往，他们将担负起救国救亡的重任。”为抗日救国奔赴内地的决心下定了，父亲毅然离别亲人，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踏上了艰难的旅程。起先，母亲对此不能理解，为此，父亲从内地的来信中经常用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来开导母亲，渐渐使母亲懂得了父亲的心，她从伤心变为自豪，在想念中感到光荣。父亲在一则日记中写道:“见慧书，对吾不愿做官一事已想通，见之大喜也。”（慧即母名）父亲又写道:“历代做大官不知有几千人，然能流芳千古者能有几人，可见不必做大

官，而要做好官，则官虽小，甚至身受戮辱，令名长存，胜大官远矣。”在另一则日记中父亲写道:“闻……南京作官去，此君本佳士，奈何竟作贼，为之叹息，痛恨者久之。”这就是父亲为何不愿在那黑暗腐败的社会里当官“作贼”的道理。

几年过去了，1941 年父亲探亲回家。父亲的归来，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温暖和欢乐。自小父亲对我们兄妹既亲切又严肃，父亲工作很忙，即使在探亲休假期间也是如此，可他总是利用点滴空闲时间给我们讲故事，每当他讲述着动人的故事时，我们兄妹三人都会听得出神。他讲述的故事，无不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平时，父亲很注意养成我们生活朴素的习惯，他不准我们学打扮，生活上不许我们过分的讲究。父亲一直很疼爱我们，从未打骂过我们，但有一次，为了我姐姐穿衣服挑剔，父亲为之大动肝火，把她教训了一顿。他说:“人不在打扮，而在心灵!”我在旁看着听着，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父亲探亲归来，同时给我们带来了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我们住在英租界，到处可见到“威武”的洋人，我们弄堂里就有不少。有一次，我在弄内玩耍，见到迎面来了一辆人力车，上面坐着一个洋人，车停下，那洋人迈步跨下车，径自往门里走去，当车夫向他要车钱时，他却蛮横地给那车夫两记耳光，打得他直流鼻血，我在旁看得吓呆了。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问父亲为何洋人要打人，父亲气愤地告诉我，外国人仗着他们的势力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欺凌中国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笔帐要记在心中。父亲教育我们不能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丧失民族自尊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父亲的爱国主义思想使我们全家都受到感染。记得祖母有一个内侄，抗战期间，他变节当了汉奸。一天，他前来看望祖母，祖母拒不接见，并决然与他断绝关系。一个旧社会的老妇人，具有这样的民族气节，这就是父亲在我们家中的巨大影响。

父亲还时常给我们讲述民族英杰——岳飞、文天祥的故事。父亲每天要命我哥哥临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帖。当父亲牺牲后，我们才意识到，在父亲的心目中最仰慕的历史人物，文是文天祥，武是岳武穆。父亲正是效法着他们浩然正气、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节，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他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起了不朽的丰碑。

温暖而富有教育意义的一年过去了，1942 年父亲再次离开我们，重赴内地。岂能料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最后的决别。

抗战胜利了。1945 年 9 月间，内地的亲友们都陆续回来了，母亲见到他们就连忙打听父亲的消息，奇怪的是，他们为何总是不谈或少谈父亲呢?

记得有一天，外面正下着滂沱大雨，我和姐姐放学回家，走进家门，却意外地见到母亲哭得像泪人一般。我们惊呆了，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从未见过她流泪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只见亲友在一旁安慰，一面也在暗暗流泪。我们不敢走近，只得在旁静听着，终于明白了，灾难降临了。噩耗传来，无言皆泪水，相告不成音，听到不敢信，信时心已碎。这简直是如雷击顶。母亲，一个纯洁善良的妇女的心，怎能经受如此沉痛的打击?

从此，一家人在悲痛、绝望中生活。起初，还有一些侥

幸心理，也许亲人会脱险归来，幻想着在绝望中能有一线希望。可是，怀念亲人的心情时时刺痛着我们的心灵，我只能在梦中见到亲人的笑影。盼啊，盼啊，盼断了肝肠，一年、两年过去了，总不见亲人归来，万恶的刽子手已夺去了父亲的生命。

父亲被残酷地杀害了，一家人在重重灾难下，整整度过了四年的昏天岁月。四年里母亲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哀，她是咬着牙关硬撑着这个家度过来的呀。这真是，生不能相养共居，死不能扶棺尽哀，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痛心疾首，千呼万唤终成空啊。从此，母亲脸上失却了笑容，一家三代只能默默地坐在一起，遥望着西南长空，寄托着我们的哀思。

我的少年时代也就是在这样的辛酸和悲痛中度过的。失去了父亲，使我的心中留下了仇恨的种子。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旧社会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身影，看到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榜样。父亲的一生使我懂得了该怎样生活。

数年的苦难岁月终于熬出了头。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阳光照遍了祖国大地，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父亲盼望着中国人民不再受欺凌的日了终于到来了。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给我们家中带来了温暖，由于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过问、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人前来慰问，并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和批示，给予我们全家政治上经济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党的培养下，我们兄妹三人相继大学毕了业，踏上建设祖国的征途。母亲为了报答党的恩情，竭尽全力投入到里弄工作中去，并当上了区人民代表。从此，全家生活沉浸在

幸福之中。

亲爱的父亲牺牲至今已三十九年了，但父亲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父亲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坚贞不屈的精神永远是我人生道路上指路明灯。父亲为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物——生前日记。在日记里，记载了他的斗争生涯，它使我懂得了该怎样走自己的路。这份珍贵遗物已成为我前进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成了我在十年浩劫中战胜迫害和打击的巨大动力，成了我在生活道路上克服困难和挫折的强大动力，成了我在生活道路上克服困难和挫折的强大支柱。我将永远珍藏它，它比任何财富更为珍贵。

今天，是我父亲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回忆过去，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悲痛和激动的泪水。怀念我的父亲，就应该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重担挑起。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时刻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是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是党引导我走革命道路；又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人民的工程师。党的恩情终身难忘。

人生总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否则就会感觉空虚和无聊。对党的坚定信念以及我父亲的光辉形象，这就是我在生活道路上的两大精神支柱，它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不能失去它，也决不会失去它。

现在，我虽已两鬓花白，但我还有充沛的精力，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进一步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不辜负革命烈士后代的称号，不辜负我亲爱的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和期望，我要继承父志，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伟大的祖国。

费莹如

顾 关 通

顾关通（1923.12——1945），又名夏再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12月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湖滨乡（现松陵镇）吴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

1936年暑期，顾关通从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毕业，考入上海弘毅中学。1936年底，吴江庞山湖实验农场招收农业管理人员，因这个农场直属于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在吴江是块“硬”牌子，经父亲再三动员，顾关通回吴江考进了庞山湖实验农场农业干部训练班。经过四个月的培训，顾关通被派在农场的二区工作。不久，日军侵华。1937年10月底，吴江沦陷，农场西撤，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关通，为了照顾年老的父母，只得回到家中。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顾关通满腔仇恨，年仅14岁的他，就开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当他听说本县的横扇驻有抗日部队时，就瞒着父母，和一个大一点的同学赶到横扇。通过一连几天的留心观察，这支队伍毫无一点抗日气息，关通感到这不是

他理想的去处，因此，只呆了一星期就离开了。为了寻求真理，1938 年春，顾关通又考入苏州草桥中学。尽管学校生活丰富多采，但亡国奴的耻辱时时刺痛着他的心，特别是中国人经过日本兵的岗哨时都要低头鞠躬，更使他深恶痛绝，不想再在苏州读书。所以只读了一学期，关通就回家了。

这时期的顾关通，考虑着自己的前途，更担心国家的命运，心情非常沉重。当时，他的父亲在县城松陵镇上有一住所，紧靠着日本宪兵队。关通和同乡同学蒋蓉生在这里住了十来天。每当夜深人静，宪兵队刑讯拷打中国人的声音阵阵传来时，关通两眼冒火、双拳紧攥，悲愤得说不出话来。怎样才能拯救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同胞？15 岁的他感到力不从心，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情况之下，他和蒋蓉生一起书写了十几封匿名信，投寄给县城里为非作歹的汉奸，痛斥他们的卖国行径，以解心头之恨。这年下半年，关通重去上海弘毅中学插班读书。一年半后，顾在弘毅中学初中毕业。

1940 年 2 月，顾关通从上海回来不久，就毅然奔赴太湖之滨的严墓区章奥村，参加了由庄绍桢同志领导的国民党吴江县抗日青年工作团，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庄绍桢同志是 1938 年 6 月由邓子恢同志派在吴江一带开展敌后抗日工作的中共党员。他

给青年们上课，讲革命道理，教唱《延安颂》、《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每天早晨带领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他还将从新四军军部带来的《八路军将领列传》、《论持久战》等书籍借给青年学习，使他们了解共产党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庄绍桢同志的引导下，关通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下定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在此期间，关通还结识了浙江南浔籍的青年张斌，两人志同道合，成了亲密战友。

1940年夏，张斌、顾关通等5人受庄绍桢的指派，到路东（苏嘉路以东）地区开展敌后工作。他们先到北厍，后又转移到金家坝。在那一带，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出版《正义》刊物，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关通还多次机智勇敢地穿过敌伪军的封锁，将刊物和传单散发到敌占区。在此同时，关通也目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互相火并、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对来犯之敌却一枪不发；也亲眼看到北厍镇上挂着“抗日”牌子的国民党吴江县党部路东办事处，吃百姓粮、用百姓钱，却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赌，干尽刮民事。关通和张斌等人忍无可忍，在一天夜里将大幅标语贴在办事处的大门上，一针见血地揭露

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关通还在《正义》上发表题为《败类》的文章，痛斥国民党投降派“挂羊头、卖狗肉”的罪行。“青工团”的宣传活动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能容忍，1941 年夏，在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中，“青工团”即被伪县政府解散了。

不久，顾关通又不畏艰险，闯过重重封锁，赶到敌后的宜兴张渚，进胥井临五中学习，渴望能留下继续参加抗日工作。但没过几个月，日军又侵入宜兴地区，学校被迫解散。关通只得又辗转回到吴江家中。

1942 年秋，伪吴江县政府公布了一个“减租”章程，名义上实行减租，实际上旨在加重压榨。顾关通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非常同情农民的疾苦。他根据广大农民的呼声，积极酝酿发起一场抗租斗争。首先，他写了一篇题为《农村一瞥》的文章，在一些农民中传阅，为抗租作舆论准备；接着，带领一批人到伪区、县政府交涉，要求实行真正的减租。终于，伪县政府不得不同意考虑重新召开“减租重征会议”，研究减租问题。在重开的“减租会”上，关通代表农民发言，义正辞严地戳穿了伪县政府假减租、真敲榨的骗人把戏；针锋相对地提出“减租应按灾情轻重、地区差

别、田块上下区别对待；农民头上捐税太重，地主应与农民合理负担”。一番有情有理有据的讲话，直驳得会议主持者无言相对，鼓舞了农民抗租的信心。但是，这次会议并未达到真正减租的目的。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会后，关通和同学韩云兰立即邀集了湖梅、施庞、泰东和顾柳四乡的农民代表，到吴模村的圆通庵（俗称“十样景”）开了一次会，组织发动齐心抗租。这次会议还吸收了“催主”（当时对收租人的称呼）参加，要他们站到农民一边来。这次湖滨四乡农民的抗租联合行动，在周围农村引起很大反响。同里、八坼等地的农民也纷纷起来抗租。伪县政府惊慌失措、恼羞成怒，立即采取镇压措施，以13个地主告发为借口，将顾关通和韩云兰抓进监牢，带上脚镣手铐，囚禁了两个多月。这次斗争，更使关通懂得“在敌人的手掌之中是不能求得活路的”，也更坚定了“到火热的革命大熔炉中去，靠党领导”的信念。

顾关通十分关心家乡的地方公益和教育事业，积极鼓励农民子弟上学念书。1943年1月，关通动员各界人士募捐重建本村校舍，自己则带头捐出两石大米，并学木刻、写诗文、印发宣传品，他的行动感动了全乡农民，短短3个月，新校舍就告落成，深受农民赞扬。

1944年春，顾关通到吴县光福乡下，以教书为名，继续积极寻找救国真理。在那里，关通见到了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真正的抗日队伍——新四军游击队，还阅读了很多的革命书籍及报刊，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这年7月，关通接到张斌从苏北新四军寄来的信。不久，他就离别了父母妻儿，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千里投军到达苏中解放区。

顾关通参加革命后，改名夏再生。他把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看成是生命的再生，充分表达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忠心。

1944年8月，顾关通在新四军一师苏中公学十一队参加整风学习。他认真学习革命真理，深入钻研整党文件。当时物质条件很困难，他就用部队每月发的一张白纸，用棉线装订成小本子，详细记录首长的报告和学习心得体会。由于他勇于解剖自己，刻苦钻研理论，思想进步很快。

1945年3月，整风学习结束后，顾关通随着粟裕司令员率领的部队南下，参加创建苏浙军区、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根据组织分配，顾关通到杭嘉湖一带农村负责搞民运工作。为了建设革命根据地，他深入敌后，热情宣传抗日，积极发动农民起来抗租减租，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一次在返回驻

地途中，遭到敌伪军的包围和追击。顾关通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敌人枪杀于浙江菱湖乡下的一个鱼塘之中。时间是1945年7月，年仅22岁。

顾关通短短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献身人民解放的一生。

解放后，故乡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将他出生的划船港村改名为关通村。1985年，在他牺牲40周年之时，湖滨乡人民政府（现属松陵镇）在烈士故乡竖起了纪念碑，原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亲笔题写了“夏再生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这年清明节，故乡人民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以此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决心继承先烈革命遗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吴致和整理)



沈　波

沈波（1925—1947），又名沈炜青、沈步青。1925年生于吴江县严墓（铜罗）镇一个殷实的小商家庭。他天资聪颖，生性活泼，6岁进南街小学读书，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喜爱唱歌、吹口琴，打篮球、乒乓球，在小伙伴中颇有威信。年纪稍长后，就有关心国家大事的意识。高小毕业这年，正逢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不久家乡沦陷，母校被烧，家境败落。

1940年夏秋，中共党员王化鹏、陈友群先后从浙西来到严墓开展工作。他们在青年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创办了“严墓青年读书会”，与青年们一起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书刊，号召青年为民族利益而斗争。15岁的沈波就象干渴的小苗得到雨露滋润，焕发出勃勃生机。他积极参加读书会，演戏、唱抗日歌曲，印发宣传品，袭击日军。积极与地下党员一起工作。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波及吴江，敌、伪、顽相互勾结，搜捕、监视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吴江。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组织安排部分党员、青年骨干撤离吴江。5 月 4 日，王化鹏、沈波奉命去新四军六师，当两人走到坛丘大谢乡附近时，被突然遭遇的日军“清乡”部队逮捕，押回吴江日本宪兵队。敌人把王化鹏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进行严刑逼供，单独关押。沈波人小，敌人未加重视，将他与另 2 人同关一室。沈等人商议，主张越狱。9 日，日军看守疏忽将一把脚链钥匙掉在牢房中，三人急切寻找出逃时机。13 日夜晚，狂风怒吼，大雨如注，沈波三人打开脚链，用小钉卸下窗上玻璃，鱼贯而出，迅速翻过院墙，急奔南门城墙，原准备以草绳系城而下，不料绳断。风雨中听得日军已追扑城下，守城伪军也被惊醒。沈波不加思索，一跃而下，消失在雨暮之中。

5 月 31 日，沈波由中共党员陈友群带领安全离开吴江，经上海、苏州转达新四军六师，被分配进行署“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中与学员们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一个月后，他又只身去盐城抗大学

习，但途经苏中地区时，敌人已开始大扫荡，盐城失守，抗大解散，于是他就此留在泰东县委，负责油印室的工作。油印室的工作繁琐而艰苦，沈波常常一个人闷在工作室里，夜以继日地刻钢板、忙油印，眼睛酸胀了，揉揉再干；夏天忍着燥热和蚊叮虫咬，冬天手脚生出冻疮。但他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42 年 3 月，沈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泰东县合并到东台县，沈波任东台县委宣传干事，并继续负责油印室的工作。

1945 年 9 月，县机关随军进入解放了的东台县城，沈波任县委青年科长，并兼任城厢区工作队队长。他根据上级指示，发动群众开展惩奸反霸运动，给汉奸、卖国贼以应有的惩处。不久，沈波调任时堰区委副书记。1946 年 5 月，他响应上级号召，带领时堰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土改运动，广大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欢天喜地分得了田地。6 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沈波组织保田队，在全区内开展保田、保家乡的群众运动。并按照县委要求，深入群众宣传“参军是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的进攻，保住‘五四’土改的胜利果实，让大家永远过上好日子。”深入浅出的道理，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激情，全区掀起了父送子、

妻送夫、兄弟相送的参军热潮，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8月，沈波任时堰区委书记。10月，国民党军占领时堰镇，沈波和时堰区委、区署的同志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同年冬，东台县的时堰、城南两区划归紫石县，紫石县委为了便于领导，将两个区合并为台南区。沈波被调到东台县三仓区委任副书记。

1947年4月，沈波调至紫石县委任台南区工作队队长。5月，因时堰地区斗争形势十分紧张，紫石县委考虑到沈波对该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又调他任时堰区委书记，着重做恢复基层政权工作。6月4日上午，沈波在甸张一农舍召开骨干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县委关于恢复天宁乡工作的指示，宣布自己为天宁乡指导员，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工作计划。会议结束后，沈波率领八九名武工队员向天宁乡行进。由于叛徒告密，武工队途经丁家墩子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的还乡团的伏击。敌人依仗人数众多的优势，向武工队猛扑过来。沈波见敌我力量悬殊，便果断命令大家向东转移，准备从三条沟涉水东渡突围。队伍边打边退来到河边，敌人紧紧咬住不放，形势十分危急。为保护同志们安全转移，保住这支武工队，沈波坚定地说:“我掩护，你们赶快游水过河。”大家知道沈波不会游水，都争着

带他过河。他大声说:“带我过河，会耽误时间，牺牲更多的同志，你们快走，不要管我。”说着就地一滚，隐蔽到一个土丘后面，开枪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了，敌人蜂涌而上，沈波向队员脱险的方向看了看，就纵身跳入水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凶残的敌人，将沈波的尸体捞上来，砍下首级，挂在时堰镇牛桥口等交通要道“示众数日”。当地军民无不义愤填膺，发誓要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沈波烈士报仇。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1966年3月，后港大队在烈士牺牲地建造了沈波烈士墓。1967年，甸张大队改称沈波大队。1983年5月，沈波大队改称沈波村，以示纪念。

(王卫平、金丽、沈炜洲整理)

寿　鸿

寿鸿（1918——1948），女，曾用名梅菊，1918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南麻汤家浜村。先后毕业于吴江县平望镇小学、镇江蚕桑学校。

1937年，寿鸿在青云天亮浜蚕桑办事处担任蚕桑指导工作，结识了吴江县地政局来天亮浜搞土地登记的胡志坚（当时胡在党的影响下，参加抗日活动）。后胡志坚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做政治工作，两人仍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寿鸿在胡志坚的教育鼓励下，逐步地接受了我党抗日民主救国，只有解放全民族才能解放自己的进步思想，她不忍日军的蹂躏欺诈，激于革命义愤，于1940年10月与胞妹寿志勤毅然离开家乡，通过日伪占领区，进入豫皖苏边区怀远县龙亢集西钮家湾的新四军四师驻地，参加了革命。

寿鸿先进淮上中学学习。当时根据地建立不

久，战斗频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极不安定，物质生活艰苦，伙食标准相当低，每人每日只有1斤米原粮，且绝大多数是粗粮，菜金每天5分法币(包括柴火费)，常吃高粮贴饼，也没有什么蔬菜，更不要说肉类了。睡的是地铺，常常是在群众的堂屋过道里铺上麦秸，许多人挤在一起睡。衣服公家无力全发，自己带什么就穿什么；难得发给一点粗布料，自己做成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向我根据地猖狂进攻，环境愈加艰险，寿鸿和同志们一起，紧密联系群众，不怕困难，经受了考验和锻炼。1941年春夏，寿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夏，新四军四师先后转移津浦路东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皖东北地区)，寿鸿先后在泗阳县任工作队长、乡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朱岗区委宣传部长、泗阳县委秘书、育庙区委宣传部长、淮北交通总局副局长等职。她在“3月反顽斗争”、“33天反日伪大扫荡”等战斗中，勇敢沉着，意志坚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1945年春夏，在寿鸿的影响下，她三妹寿志民也投奔淮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1946年夏秋，寿鸿随部队转移去苏北、鲁南的渤海地区，任华东野战军九纵留守处妇女干部队队

长。她在随队北移途中，把整个身心全部扑在工作上，对事业满怀信心。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事事以身作则，处处关心同志，并常常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全力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后来，寿鸿终因积劳成疾，因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医治无效，1948 年 9 月 8 日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平县段家店病故，年仅 30 岁。

寿鸿遗体安葬在德平县后刘家二区烈士陵园东北第三冢。1954 年，山东省民政厅为寿鸿墓立碑志文。

（徐佑永整理）

潘 天 扬

潘天扬（1918—1949），1918年10月生于吴江县坛丘乡坝里村，曾用名沈月明。

1941年二三月，中共浙西路东特委所属的严墓区委书记赵子扬与中共海北工委海盐工作团团长蔡允中先后转移来吴江县坛丘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中共大谢支部。党组织在大谢农村采取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古老方法联络感情，组织群众。当地农民潘天扬、钱福宝、顾春泉等踊跃参加，很快在村上办起了夜校，宣讲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潘天扬积极肯干，四处奔走，为贫苦农民说话撑腰，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敌人。潘天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该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天扬入党后，更加忘我地工作，深入农户调查，组织学习老区实行“二五减租”的政策，在一些乡村召开减租减息说理会，迫使地主、富农同意减

租。同时注意耐心教育倾向抗日的乡、保长为我党服务。为了对付猖狂一时的日军扫荡，大谢党支部提出了一套各村联防的办法，潘天扬等党员认真做好联村会的串联工作，遇有敌情通风报信，使农民生活稍得安定。

1941 年底，大批“忠救军”特务队涌到严墓地区，日伪军频频扫荡，四处布设暗哨，搜捕共产党人。外来党员奉命全部撤离吴江，大谢支部暂时失去联系，坛丘的农村党员也都转入地下。

在白色恐怖的逆境中，我地下党员顽强地坚持斗争。1942 年 4 月，中共新塍区委书记沈如淙受中共嘉兴县委指示来吴江县坛丘恢复大谢支部，地下党员重新填表登记。潘天扬被推选为党支部武装委员。支部以大谢乡为基点，在平望、盛泽、南麻、梅堰、震泽等地秘密发展党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

1946 年冬，潘天扬去盛泽染坊中开展活动，发展党员，翌年建立中共灰练坊支部。

1947 年，大谢支部在浦东转移来的党员肖斧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党支部组织党员，发动群众，选择有利时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年底，中共杭嘉湖工委书记方休来大谢乡筹备武装，与潘天扬等党支部委员连续开了两个通宵的会，并在大谢农村实

地察看地形。方休等认为大谢乡一带环境条件都很好，可联系苏浙边界地带好几个县，东南西北都有回旋余地，决定在这一带搞武装。为此，党支部专门研究了如何组织斗争、配备武装干部、解决枪支弹药等问题，商定先展开秘密武装活动，搞一批武装联络点，然后再成立公开的游击武装。此后党支部几次组织了运枪活动，并作出了从敌人那里去搞枪支的决定。

1948年4月23日，是新塍传统庙会日。大谢党支部决定乘人多拥挤之机突袭敌人，由支部武装委员潘天扬和党员顾阿坤去执行这任务，上级领导沈如淙坐镇香灰桥茶店亲自指挥。那天，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农民拥到新塍赶庙会，潘天扬与顾阿坤按既定计划袭击了驻新塍镇东岳庙的新北乡国民兵队班长金振声，并缴了他的枪。当时枪声一响，庙会秩序大乱，国民兵队惊慌失措，东奔西跑，当敌人清醒过来追击时，潘、顾已经跑过来龙桥，迅即撤回了大谢乡。这次夺枪活动使党的影响很快地扩大到嘉兴、吴江两县的广大地区，并有力地震慑了敌人。

不久，潘天扬、顾阿坤由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介绍去青东参加“江南人民反征总队第一支队”，潘天扬在该部队任组长。这支游击队流动在淀

山湖东一带，白天埋伏，晚上活动，有时支队集中行动，有时分组活动。潘天扬在部队勇敢善战表现突出。一天，部队在向重固方向转移途中，潘天扬小组8个人正在村里的一幢房子里，突然出村口的桥被敌人封锁了，敌以两个营的兵力进村扫荡，阵阵枪声向村里射击，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潘天扬带领大家从后墙窗户翻出，跳入河中潜泳撤退。潘天扬一口气游过六七条河浜，他一直游在最前面，一边摸清情况，一边在河岸系好绳子，让不会泅水的人顺利过河。接着潘天扬又敏捷地抄到敌人背后，用步枪把敌人的机枪手打掉，封锁了石桥的敌人火力。使全组同志安然突围脱险，但自己却与全组同志失去了联系，后来负了重伤。

青东游击队大队长陆雪林把潘天扬托给重固开上海的航船老板，让他把潘藏在航船的货仓里带到上海垃圾桥埠头。当晚，中共吴嘉工委书记金佩扬和党员吴阿炳（吴江县庙头人）弄了一部黄包车，把潘藏在阿炳家三层阁楼上，由十六铺民船工会医务室余澄怀医师秘密给予医治，请邻居帮助照顾潘天扬的吃饭、洗衣、换药。当时正值夏天，潘天扬伤口发臭，臭气一直薰到楼下厨房间。有关同志不畏辛劳，悉心照料，潘天扬十分顽强，咬紧牙关，不哼不叫。三四个月后，身上的弹片才取出，伤口

终于愈合了。

1949 年初，中共淞沪工委浦西特派员陈伯亮安排潘天扬去南汇县坦直桥当勤务兵。5 月下旬，潘天扬在一次误会冲突中不幸被打死。年仅 31 岁。

解放后，吴江县人民政府追认潘天扬为革命烈士。

（徐佑永执笔）

吴 义 琛

吴义琛（1914——1949），女，吴江县震泽镇人。1914 年 8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早亡，母亲为家庭妇女，家境贫苦。她自幼勤奋好学，1931 年，就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她和同学一起到南京请愿，被国民党政府强行驱散。吴义琛看清了反动政府的腐败，认识到必须寻找真理，拯救祖国。1934 年，她从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后，到杭州清泰门外稔稼桥小学教书。1938 年初，她女扮男装，由家乡到上海、宁波，尔后到皖南泾县茂林参加了新四军。

1941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她随部队突围转移苏北淮阴、淮安地区。在淮河流域一带活动，在苏北平原辗转战斗。1946 年 6 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吴义琛随部队在苏北、鲁南一带战斗，时任苏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政治指导员。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医治无效，于 1949 年 7 月 25 日在山东济

南光荣牺牲，时年35岁。当地政府将他安葬在济南市东门外白马山上。

（吴蓉华整理）

吴毓骅

吴毓骅(1925——1950)，1925年出生，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县湖岭区下瑶村人，毕业于浙江省温州师范学校。

1946年秋，吴毓骅来吴江县严墓区合作社任指导员。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处处鱼肉人民。吴毓骅在日常工作中热诚待人，紧密联系劳苦群众，带领当地农民努力发展严墓地区的农副业生产，他经常深入到严墓西亭村，发动农民入股，筹组基层生产合作社。他与当地群众邱瑞林、严明华等人，在集贤第8保组成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他们动员各户农民预定化肥、定购蚕种，帮助分发、记帐，一年春夏秋三季，办事人员都是义务为农民服务。



1947年秋，西亭村又组织了一个蚕桑生产合作社，吴毓骅等动员蚕农定购苏州浒墅关大有蚕桑制种场培植的“老虎牌”、“壬戌牌”等蚕种，吴毓骅崇敬留学日本，热心发展中国蚕桑事业的费达生先生，

聘请浒关蚕桑专科学校师生来严墓区推广稚蚕共育，实行了一系列新的养蚕方法，改革旧的一套土法，使春蚕产量大增，茧质提高。

吴毓驊性格耿直，不畏强暴，在维护蚕农利益、推广优良蚕种方面，触怒了吴江县政府秘书、严墓区合作社名誉主任陈某。当时陈妻在县城北门外私人开设蚕种场，蚕种质量低劣，但售价极高，她通过区长和乡长硬要吴毓驊销售其品种，吴毓驊因坚持不改原定的浒关良种，被撤掉了工作职务。

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老百姓死活，敲榨勒索，要钱要粮。吴毓驊不胜愤怒。当时，严墓地区一头牛也没有，靠落后笨重的耕作方法，农民面朝黄泥背朝天，终年劳累，还不得温饱。吴毓驊体贴同情农民们的疾苦，热心为老百姓做好事。他为了帮助西亭村农田抗旱排涝，到处奔波凭借贷到的1台7马力立式戽水机，先后灌溉了角享圩、南塘圩、羊眼兜等230多亩农田。

吴毓驊心地善良，关心群众疾苦。1947年夏，西亭前浜有一老汉因住房不慎失火，大火把附近七八户农民的20多间房屋烧得片瓦无存。吴毓驊十分同情受灾群众，与邱顺林、严明华等代受灾户向当地政府报告灾情，要求救济，并想方设法向社会呼吁，拯救灾民。他终于较快地筹集到了一些救济钱

款和物资，解决了灾户的燃眉之急。

吴毓骅与沈健男、张光启等人看到农村文盲充斥，十分难受，决心唤醒劳苦百姓读书识字、明白道理，他们一起在东亭凌家厅办了一所农村成人夜校。吴毓骅不辞辛劳，热心教育，晚上还来校教唱进步歌曲。在他的努力下，夜校办得很热火。

1948 年春末，解放大军节节胜利，蒋管区的反动机构，更是疯狂压榨老百姓，抓丁要粮，动辄戒严，一片白色恐怖。人民怨声载道，惶惶不安。其时，吴毓骅与张光启等一批农村青年志同道合，相处融洽。张光启年约 20 岁，工作认真热情，他与盛泽区大谢乡公所事务员胡国钧（中共地下党员）都是苏北如皋县人，关系甚是亲密。胡曾任中共如皋区委书记。皖南事变后，胡受组织派遣来江南做党的地下工作，失去组织联系。胡在大谢乡工作期间，由盛泽地下党员俞双人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胡国钧不久单线介绍张光启入党。张光启经常与严明华一起议论政事，宣讲苏北战场形势，秘密送油印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件给严阅读。是年秋冬，张光启、严明华在严墓镇东北郊一所小庙内接线，密商工作。吴毓骅骤然闯入，他们通过密谈，情投意合。吴毓骅激动地表示：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年，今天终于看到了光

明，依靠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个人才有前途。吴提出了要求入党的愿望。一个多月后，由张光启陪同胡国钧，带来了上级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已经胜利，要大家调查敌人动态，做好工作，组织老百姓抗税、抗粮、抗丁，迎接大军渡江。吴毓驿经过张光启介绍、吴国钧批准入党了，吴毓驿从此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更积极而镇定地进行工作。

1949年4月，吴江解放后，由丛树华、孙敏、周丕新、孙功雨、张吉田、杨绪芝、杨德清等组成的中共严墓区委员会，很快与吴毓驿、张光启、严明华等接上了关系。5月中旬，完成了接收区、乡（镇）公所，建立基层人民政府。吴毓驿为严墓区收茧委员会主任，负责收购鲜茧兼管合作社工作。

解放初期，潜伏匪特造谣扰乱，群众人心惶惶。吴毓驿和地方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剿匪肃特，稳定社会秩序。并宣传政策，帮助大家生产救灾，借粮支前，工作异常艰苦。

1950年，吴毓驿受组织分配担任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乡（现八都乡勤新大队）乡长。是年，春荒特别严重，他不畏艰难，深入农户，组织群众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己节衣缩食，日夜辛劳，满腔热情地将大批粮食发到老百姓手里，让人民群众度

过灾荒。

此时，政府发了一批救济粮，上级规定要分给贫雇农民。但一些坏分子要平分，土匪还强行向贫农勒索大米。吴毓驊知道后，鼓励群众说:“你们别怕，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难道还怕这几个小土匪吗?”5月17日，吴毓驊佩带短枪，只身过河到灾情特别严重的鱼池廊（现八都乡勤丰村14队），召集贫雇农开会，要求救济粮一定要分好发好。下午二时许，国民党匪特张本一伙十余人突然包围了吴毓驊，吴拔枪反抗不及，被匪徒射中7弹，壮烈牺牲，年仅25岁。鱼池村群众得讯后，无不痛哭出声。

吴江县公安局、震泽区公安局的全体干警，十分重视这一惨案。后从上海将这伙匪徒捕获，予以法办。

吴毓驊英勇牺牲后，中共吴江县委在县政府大礼堂召开了全县区乡干部群众千人大会，追悼吴毓驊烈士。县委书记鲁琦、震泽区委书记刘涛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县干群向吴毓驊同志学习，更好地做好新解放区的各项工作。

震泽区人民政府，十分崇敬吴毓驊的业绩，在震泽公园内修建了吴毓驊烈士陵墓。

（徐佑永整理）

陈 耀 庭

陈耀庭（1932–1970），1932 年 9 月生，吴江县震泽镇人。1949 年他没有高中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选送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分配在中央军委华东二局任机要员。1951 年 3 月入团，1955 年 6 月从部队复员，同年 9 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1961 年 9 月，和他的同学、妻子谢聚璋毕业分配到偏僻的山区——江西瑞金大学任教。1962 年 8 月又调至赣南医专。

陈耀庭和谢聚璋都是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经过勤奋自学，参加高考继续升学的。是在党和国家的培育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关心时事政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钻研业务，共同研究问题，常在一起谈论学习体会，交换对国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探讨正确认识真理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正是陈耀庭施展才华、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黄金时代，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早在1960年，陈耀庭就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看法，对彭德怀同志所受冤屈表示不平。1963年11月3日，陈耀庭在写给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学的信中明确地说：“三年大跃进是一种左倾错误，……对国家建设和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损失。”“彭德怀是正确的，要恢复彭德怀的‘名誉’、‘官职’。”还说：彭德怀“敢于这样大胆提出意见，是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而且意见本身也是正确的。因此，不仅应该给彭德怀平反，而且应该表扬他这种敢于批评、坚持真理的精神。”陈耀庭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中肯的言辞，在当时竟被错误地认为是“攻击‘三面红旗’。”在瑞金大学时，陈耀庭因所谓“预谋反革命集团”案，受到开除团籍、行政开除留用的处分，社教后留在赣南医专附属医院干收费工作。

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陶冶过，又在名牌大学深造过、一心想为党干番事业的陈耀庭面对如此大的打击，没有哭泣，没有颓废，仍以坚实的脚步，走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

妻子谢聚璋对丈夫十分了解，政治观点也一致。1962年，她两次向上级和政法部门写信为陈耀庭申诉，却被认为是和“反革命爱人”划不清界限，为“反革命分子”翻案，受到批判，开除了团籍。政治上的打击，生活上的清贫，并没有改变陈耀庭夫

妇坚持真理的信念。此时，谢聚璋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陈耀庭的母亲也从老家来了，谢聚璋还是和过去一样，尊敬婆母，勤俭持家，和睦相处。有个好心的女教师曾问过谢聚璋:“陈耀庭这个样子啦，你怎么没同他离婚?”她爽朗地回答:“以后总会弄清楚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到“炮打司令部”，运动逐步升级。党的不少组织陷入瘫痪，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受到揪斗、绑架、殴打、游街……，一大批几十年来对党忠心耿耿的领导同志突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耀庭这位一贯不愿随波逐流而勇于捍卫真理的斗士，对这场政治风云，仔细地观察着，深深地思索着……

他不止一次地回忆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止一次地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著作，从历史实践到经典理论到目前现实，反复地思考，但怎么也理解不了这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他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与人民关系的那些论述，为什么今天却出现罕见的封建主义“返祖”现象呢?

他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为什么现在却是靠《语录》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把这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大普及”？

他想到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大批老干部，走过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穿过了枪林弹雨，经受了敌人的铁窗酷刑，而今却被关押在由自己双手夺过来的监狱里，倒在用自己鲜血解放出来的土地上。又怎么会成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呢？

陈耀庭翻来复去地苦苦思索，终于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应该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受害的同志申冤！陈耀庭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贴出了一张反对炮打党委、拥护校党委领导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党的深厚感情。可是，却遭来了灭顶之灾。

一天下午，陈耀庭刚吃过晚饭，和往常一样，打个赤膊，穿条裤衩，提水洗澡去了。那知刚进澡堂，突然闯进一伙红卫兵，二话不说，扭胳膊的扭胳膊，按头的按头，挂黑牌的挂黑牌，推推搡搡地将陈耀庭从澡堂里拉出来。

“怎么回事？”面对这突然降临的灾难，陈耀庭眼里闪出惊疑的神色。

“哼！装什么糊涂！陈耀庭，你写的大字报，为什么要把共产党的“党”字涂得那么粗？你这就是影射我们党一团漆黑！你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写得模糊不清，这是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糊里糊涂！”他们拳打脚踢，押着赤膊的陈耀庭游了校园。就这样，飞来横祸，陈耀庭成了赣南医专第一个被揪的“牛鬼蛇神”。

虽然陈耀庭已是“专政对象”，“不能乱说乱动”，但他仍心忧天下，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谢聚璋在上街看大字报时，总是细看久想认真摘录，并注意收集各种传单、小报，注意了解各类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映，晚上将了解的情况告诉陈耀庭，一起分析研究。陈耀庭认为，看一个政治口号正确与否，应该“看它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认为“炮打司令部”的口号是违背马列主义准则的，必然会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恶果。事态的发展使陈耀庭更加坚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他对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由怀疑、不满变为坚决反对，他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直言不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陈耀庭决心用自己的笔，揭露罪恶，唤醒民众。他经常深夜关好门窗，拉好窗帘，奋笔疾书。自 1966 年 10 月至 1967 年 12 月止，陈耀庭先后

写出了《陷害一大片，抬高一小撮——驳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的两篇文章》，《黔驴技穷——驳“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13篇文章。同时，还接连写出了《致毛泽东信》、《致中共中央信》、《致周恩来总理信》、《致刘少奇主席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等14封信件。在这10多万字的文章和信件中，陈耀庭对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意见。

他认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使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巨大损失。“爱党有罪，害党有功，坚持马列主义的受害，背叛马列主义原则的受奖，刚直不阿的罢官，阿谀奉承的升职，工农劳模扣上‘保皇派’、‘反革命’的帽子，社会渣滓加上‘革命派’、‘真左派’的桂冠，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

他怒斥“林彪是党内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是李林甫式的人物”，“江青，这个慈禧式的皇后娘娘，和历史上的内宫揽权一定要勾结外臣一样，和林彪正好狼狈为奸”，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埋在毛泽东身旁左右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中央文革小组欺上压

下，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方针”，其成员“许多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今天他们个个都成了操纵党和国家命运的权威人士，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他严正提出必须撤销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有关的一切办事机构，恢复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恢复遭受打击的所有干部的名誉和职务。

他提出为什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一步登天，身价百倍，报上对她的吹捧也与日俱增”？“叶群，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人，因为是未来的‘娘娘’，所以文化革命中也一鸣惊人，列入‘领导人’队伍”。他愤怒谴责妄想当20世纪女皇和未来娘娘的江青、叶群，深切怀念为中国妇女运动披荆斩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妇女运动领袖，严厉责问：“江青、叶群他们为党作过多少工作？为革命作过多大贡献？当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变为党政军要人、而名噪一时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考虑，为什么为革命长期工作并有重大贡献的妇女界著名人物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反而默默无闻了呢？试问：“这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他断言，“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受到彻底清算，受害的同志一定会得到昭雪，林彪、江青等罪魁祸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靠强权来压制真理只是一

时，不可能长期压制下去”，“林彪、江青一伙现在虽然炫耀一时，但只是三月桃花一时红罢了。”

陈耀庭对于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是“党的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斗争历史长、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对革命贡献大、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央负责同志”，“刘少奇同志是正确的”。“‘打倒刘少奇’是反动口号，刘少奇同志是被诬害的”，并高度赞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列主义的光辉著作”，“它对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党干部培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否定而且绝对否定不了的！”他坚决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对党赤胆忠心的老干部，认为广大干部“坚持原则，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为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当向这些同志“表示最亲切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

陈耀庭大胆地反对个人迷信，认为“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运动”。并声讨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谗臣奸妃的反革命行径。陈耀庭同志1966年10月直接上书毛泽东同志，陈述对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意见，还运用马列主义观

点，在许多文章和信件中，痛斥了林彪鼓吹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以及“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等谬论。

陈耀庭此时已不能随便请假外出，他写的文章和信件，由谢聚璋利用上街看大字报或买东西的机会，单独一人向市内几个邮筒投寄了3次。1967年6月29日赣州市大武斗后，陈耀庭夫妇俩在赣江边亲眼看到武斗流血的后果，更加担心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党的生存。陈耀庭连续好几个夜晚奋笔疾书，写下了《再告全国人民书》、《向青年学生进一言》、《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并把以前写的评论文章重新复写出多份放在一起，经过伪装和技术处理，一一分装在信封里。这是第4次投寄。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谢聚璋带着放有信件的书包走出校门，陈耀庭借了一辆自行车，说是请假外出看病，也出了校门。两人见面后，交换了书包，约好9点钟在公园前百货商场会面。随即陈耀庭骑上自行车，钻进了人流。陈耀庭绕赣州城转了一个大圈，不到1小时便把所有信件分别投进了11个信箱。

他们在书写、投寄文章、信件的时候也曾有过痛苦的思索，深知这样做随时都有被推上断头台的危险，那时家庭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他们夫妇俩



考虑再三，在1967年8月2日致周总理的信中表明了上书的决心，信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到我党我国遭受这样巨大的劫难，我们感到万分悲痛！我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日夜反复想一个问题：怎样挽救我们伟大的党?”“只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只要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能够发展，只要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原则能够恢复，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们也心甘情愿，毫不畏惧！”凭着这钢铁般的信念，陈耀庭勇敢地写下了传播真理的文字，并迅速将它们投寄了出去。当时陈耀庭夫妇哪能知道，这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上书，却成为惨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枪口下的“罪证”。

陈耀庭所写的一篇篇文章，一封封信件，象长矛利剑直刺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1967年7月，陈耀庭匿名投出的部分文章、信件，被列为全国特大“677”反革命案件。省里派出专人坐镇赣州指挥侦破，全区各县都成立了侦破小组，各单位以“造反派”为核心，组织了170多个侦破小组。开始，办案人员分析：这批信件文章必定出自“死保刘少奇反动路线”的老干部之手，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不懂党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于是把当时地直、赣州市、大专院校和各县的党员领导干部都

列为可疑对象。逐个进行排队，对笔迹，严密审查和侦破。后来，从陈耀庭的笔迹中找到了特点痕迹。1967 年 12 月 31 日，陈耀庭秘密被捕了。40 天后的 1968 年 2 月 11 日，谢聚璋也被投进了牢房。

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就此罢休。1968 年 2 月，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窜到赣州，亲自接见专案组人员，指令继续追查“后台”，妄图从他们的口中挖出“大人物”来。在关押中，专案组对他俩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日夜逼供，并恶毒地挑拨离间。在审讯陈耀庭时，叫他交待揭发妻子谢聚璋；在审讯谢聚璋时，逼她揭发陈耀庭。但不论采取什么卑鄙恶毒的手段，除从抄家中得到的信件、文章底稿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指使者和所谓“后台”。

1970 年 3 月 16 日，陈耀庭在狱中被宣判死刑，但他仍从容自若，在看守所的空地上，他拼尽全身力气，振臂高呼：“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人民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的口号震憾监狱，冲破监狱高耸的围墙，在古城的上空回响。林彪、“四人帮”在赣州的爪牙们吓得要命，慌作一团，急忙用粗麻绳穿住竹筒紧紧勒住陈耀庭的嘴巴，才将囚车开往设在体育场的宣判会场。在万人宣判大会上，陈耀庭、谢聚璋从两边大

义凛然地走上“宣判台”，嘴巴被套有竹筒的粗绳紧紧勒住的陈耀庭和被打得蓬头乱发、血迹满面的谢聚璋深深地双目对视，互相鼓励，以革命强者的战斗姿态，对这种宣判投以轻蔑的目光。结果，陈耀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谢聚璋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刑场上，执法人员问陈耀庭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为捍卫真理，陈耀庭早就置生死不顾。此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想见妻子一面，说几句告别话，便用力点了点头。执法人员把他嘴上的竹筒解开，陈耀庭说：“我还有话要交待。”多少次审讯陈耀庭都不承认有后台，他们高兴地以为现在要交代后台了。刑场上顿时忙乱一团，又是电话，又是发报，向省里请示。最后，陈耀庭被押回看守所，面对再次逼供，陈耀庭提出要和妻子一起回忆回忆。最后一次揶揄了那帮人。

那是怎样的一次见面啊！多年的患难夫妻曾倾诉过千万句知心话，而这两年多来，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之下，夫妻被关押隔离，没有说过一句话。在这生死离别之际，有多少话要同亲人倾诉啊，然而陈耀庭却说得不多。

“我能最后与你说上几句话，死也甘心了。你虽然判了死缓，但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胜利的那一

天！……”

“我们是无罪的，我是为真理而死的，总有一天，人们会替我们说话！……

“聚璋呵，告诉父母，那怕是吃再大的苦，也要抚养好两个孩子，要让他们做一个正直的有理性的人！”

3 天后，几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陈耀庭的胸膛。时年38岁。

宣判大会后，赣州看守所对带回狱中的谢聚璋又进行一次审训，还是要追“后台”，谢聚璋强硬地训斥他们：“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交[illegible]”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谢聚璋被送往波阳县珠湖农场劳动改造。当年7月11日下午，谢聚璋在劳改农场受尽迫害含冤身亡。

一人遭难，株连九族。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不管这个“难”落在谁的头上，除自己要担当风险、坐牢、杀头外，亲属子女也难免劫难。陈耀庭、谢聚璋入狱后，丢下了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祖孙3人象断了线的风筝，无依无靠，他们饱含悲愤的泪水，不安地等着亲人回来。然而，等来的却是另一场灾难：暴徒们接连多次抄家，夺走了全家稍好一点的衣物；抢走了所有的银行存款，就连两个孩子平时1分、2分积蓄起来的16元多钱也被拿

走。

当那伙人乱翻书橱时，老奶奶深深知道，书是儿子、媳妇最心爱的东西，奋力上前阻挡，却被他们一脚踢倒。那伙人还经常不明不白地拉老人家去审问、罚跪，侮辱，谩骂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反革命狗崽子”。老奶奶在赣州无亲无朋，只好到街上请人代笔，写信给震泽老家。陈耀庭的父亲见信后，心急火燎，不顾跛脚的困难，千里迢迢赶到赣州，满怀悲愤地将祖孙三人接回老家。回老家后，老奶奶一病不起，含恨去世。

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曾不可一世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跨台了！1980年10月4日，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决定，为陈耀庭、谢聚璋平反昭雪。11月22日，由中央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为真理而献身的陈耀庭、谢聚璋烈士的英名如赣水长流，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沈坤荣整理)

吴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备注
张应春	女	1901.11	北厍镇黎星村葫芦兜	1923	1925.10	中共江浙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长	1927.4 在南京被捕牺牲	字蓉城 别号秋石
孙世实	男	1918.3	七都乡叶港村张港	1936	1936	全国学联领导成员	1938.10 在武汉遭敌机轰炸牺牲	又名孙方
沈文潮	男	1915	盛泽镇里安街	1940.9	1941.8	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情报部门地下工作者	1941.8 在吴江被捕牺牲	
俞清志	男	1917	安徽省南陵县溪家滩	1938		国民党吴江县三区区长	1943.1 在吴江严墓牺牲	
倪淑英	女	1916.10	松陵镇下塘街	1937	1937	晋察冀公安局秘书主任	1943.10 在河北涞源牺牲	曾用名宋维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张梓楠	男	1916.6	盛泽镇里安街	1939		新四军卫生部药剂师	1944 年在反扫荡中坠马受伤、病故	
姚之英	男	1921	铜罗镇西汇	1939	1940.11	中共太湖新安区委书记	1944 在无锡被捕牺牲	曾用名 姚达 姚魁元
陈有民	男	1922	铜罗镇民主街	1939	1940.4	新四军 6 师 18 旅 52 团 2 营 4 连指导员	1941 在杨树园战斗中牺牲	曾用名 陈子耘
顾关通	男	1923.12	松陵镇吴模村	1944.7	党员	地下工作者	1945.7 在浙江菱湖因战牺牲	曾用名 夏再生
寿保全	男	1921.7	震泽镇新幸村田鸡坝	1944.8	1946.7	华中野战军 6 纵 48 团 4 连机枪班班长	1946 在涟水因战牺牲	
沈　波	男	1925	铜罗镇	1940	1942.3	中共东台县时堰区委书记	1947.6 在东台被捕牺牲	曾用名 沈步清
赵小义	男		松陵镇北门外城郊	1944.2		解放军 4 纵 12 师 36 团 3 营 7 连班长	1947 在山东莱芜战役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杨殿科	男	1920	黎里镇西新街10组				1947在卡仑战斗中牺牲	
寿　鸿	女	1918.6	南麻乡汤家浜村	1940.10	1941. 春夏	华东野战军9纵留守处队长	1948.9在山东德平病故	曾用名 梅菊
任云标	男	1925.12	震泽镇桥头村长滩洋	1948.12		解放军61军183师547团2连战士	1949.4在山西太原牺牲	
潘天扬	男	1918.10	坛丘乡坝里村雄湾上	1941.	1941.9	江南人民反征纵队第1大队组长	1949.5在上海南汇牺牲	曾用名 沈月明
吴义琛	女	1914.8	震泽镇砥定街6组	1938	党员	苏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政治指导员	1949.7在济南因公牺牲	
倪金龙	男	1923.5	南麻乡东庄村东阳桥	1946	党员	严墓区南麻乡副乡长	1949在吴江因公牺牲	
钱康民	男	1907	松陵镇北下塘4号	1929	党员	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司令	1939.8.23在七都隐渎村遭敌袭击牺牲	由长兴县追认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丁秉成	男	1908	山东省峄县	待查	二战期间	中共吴江支部书记、江浙太湖抗日义勇军副司令	1939.8.23 在七都隐渎村遭敌袭击牺牲	由湖州市追认
王化鹏	男	1916	浙江省嵊县	1937	1937	中共严墓镇支部书记	1941.5 在吴江被捕牺牲	曾用名 王听涛 由嵊县追认
虞仞千	男	1921	浙江省新塍	1938	1941.8	中共情报部门地下工作者	1941.8 在吴江被捕牺牲	由嘉兴县追认
顾葆恒	男	1916	同里镇富干街	1937.11	1940	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政治部组织科长	1942.7 随师部转移途中病故	曾用名 戈白章
费　巩	男	1905	同里镇	1941		浙江大学政经系教授	1945.3.5 被密捕后惨死在渣滓洞	由上海市追认

吴江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备注
杨文康	男	1931.7	松陵镇白龙桥村杨家浜	1949.5		志愿军空军观察员	1950.11 在朝鲜失去联系	
胡登贵	男	1930.10	松陵镇芦荡村西大陆港	1949.5		志愿军 20 军 60 师 176 团 8 连战士	1951 在朝鲜失去联系	
董卫忠	男	1949.10	松陵镇芦荡村横港上	1968.3		解放军 9624 部队 67 分队战士	1970.5.19 在徐州因公牺牲	
梁信安	男	1942.4	松陵镇高星村杨家港	1964.3	1969.2	解放军 6412 部队司令部通信连排长	1971.1.28 在浙江定海因公牺牲	
吴兴根	男	1955.8	松陵镇柳胥村	1974.12	团员	解放军 83414 部队战士	1977.2.23 在溧阳因公牺牲	
张洪喜	男	1927.11	八坼乡友联村吴家馆	1948.7		26 军 76 师 227 团 1 营 3 连战士	1949 失去联系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陈永观	男	1946.6	八坼乡练聚村木行港	1966.3	1967.12	解放军6811部队1营1连战士	1967.12.19 在援越抗美中因战牺牲	
刘荣华	男	1958.12	八坼乡石铁村刘家港	1979.1	1979.9入团	解放军52834部队战士	1979.9.4在河北丰宁因公牺牲	
王金生	男	1914.9	同里镇新填街书场弄	1948.10		志愿军31军92师275团担架员	1950在朝鲜失去联系	
张木根	男	1933.3	同里镇潦浜村姚家埭	1951.2		志愿军炮兵41团2营5连战士	1951.7.14在朝鲜因战牺牲	
张洪富	男	1926.3	同里镇厍浜村金狮浜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1.12.23 在朝鲜因战牺牲	
翁元泉	男	1928.9	同里镇后浜村马家浜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1.12.23 在朝鲜因战牺牲	
殷德泉	男	1935.7	同里镇湖南村曹家浜	1953.1		志愿军179师37团2营6连战士	1953.7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吴海生	男	1920.2	同里镇北圩村后浜	1948		志愿军 24 军 209 团 2 营 4 连班长	1953.6.23 在朝鲜因战牺牲	
吴凤昌	男	1934.5	同里镇照浜村葫芦兜	1951.3		志愿军炮兵 41 团 2 营 4 连战士	1953.9.12 在朝鲜因战牺牲	
董加良	男	1928.1	同里镇三元街任家弄	1949.4		解放军 0936 部队独立 2 分队副排长	1954.7 牺牲在山东牟平	
陈菊生	男	1940.10	同里镇双庙村李家港	1960.1	1957.7 入团	海军 1072 部队 523 舰水雷兵	1960.12.23 在安徽安庆因公牺牲	
张亦凡	男	1947.8	同里镇燕浜村沈家浜	1965.9	1968.8	解放军 53014 部队 65 分队副政治指导员	1979.2.21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	曾用名 张中琪
周　杰	男	1923	菀坪乡南村万平	1949		志愿军 27 军特务团 1 营战士	1951.5 在朝鲜因战牺牲	
蒋德生	男	1924.4	菀坪乡南湖村	1949.5		志愿军 27 军 81 师 242 团战士	1951.5.2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备注
卞洪根	男	1932.10	菀坪乡诚心村东城		1956.9入团	菀坪乡木工	1961.2 在吴江因公牺牲	
朱阿来	男	1925.6	屯村乡斜港村徐家娄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监督排战士	1951.7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朱阿米
凌继生	男	1935.2	屯村乡三友村沈厍港	1951.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卫生员	1953.7.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杨考先	男	1924.5	莘塔乡南浜村南庄	1949.3		26军77师231团2营战士	1950.10 失去联系	
潘才发	男	1916.11	莘塔乡港字村角字	1949		志愿军第9兵团20军58师173团副班长	1950.11.28 在朝鲜因战牺牲	
杨回兴	男	1930.1	莘塔乡友好村善湾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9.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吴佩庆	男	1930.9	莘塔乡荡西村吴家村	1953.2		志愿军铁道兵团3师9团战士	1953.3.19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周云山	男	1944.4	莘塔乡莘塔镇	1965.1	1966	解放军 8335 部队 313 大队战士	1967.11.3 援越抗美因公牺牲	
程雪明	男	1944.6	莘塔乡吴湾村吴家埭	1965.10	1967.4	解放军 0497 部队工兵 3 连副连长	1969.12.30 在广东台山因公牺牲	
蒋伍根	男	1940.10	莘塔乡新庄村新村	1960.3	1962.9	解放军 1592 部队后勤处助理员	1971.3.12 在内蒙呼和浩特因公牺牲	
夏其林	男	1960.12	莘塔乡莘塔渔业村	1978.4	1979.5 入团	解放军 8628 部队战士	1979.7.31 在江西泰和因公牺牲	
陈春华	男	1923.4	芦墟镇爱好村白荡湾	1946.12			1950.5 在山东荣军管理所病故	
刘明顺	男	1920.2	芦墟镇东北街许家弄 2 号	1948.11		志愿军 38 军战士	1950.12.16 在朝鲜因战牺牲	
费小留	男	1927.6	芦墟镇东北街 14 级 45 号	1949.5		志愿军炮兵 16 团 2 营 4 连通讯员	1951.5.10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顾海和	男	1925.6	芦墟镇秋甸村秋水潭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电话员	1951.10.16　在朝鲜因战牺牲	
倪留桂	男	1924.4	芦墟镇新友村孙家湾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1.1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葛鹤年	男	1933.8	芦墟镇西中街西栅13号	1950.2	1949.9 入团	解放军上海空军司令部机关战士	1952.1.23 在上海因公牺牲	
石春生	男	1924.5	芦墟镇西北街詹家弄8号	1942	党员	志愿军120师359团3营8连战士	1952.5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 刘来兴
杨祥元	男	1930.5	芦墟镇西湾村田鸡浜	1951.2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2.8.30 在朝鲜因战牺牲	
张根生	男	1929.5	芦墟镇爱好村白荡湾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9.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蔡其生	男	1922.8	芦墟镇新南村南赵田	1950		志愿军某部战士	1952 在朝鲜失去联系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凌补生	男	1927.12	芦墟镇东玲村	1951.6		志愿军工兵3团2营4连战士	1953.4.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吴马金	男	1930.4	芦墟镇甘溪村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3.6.16 在朝鲜因战牺牲	
陈卯根	男	1931.4	芦墟镇芦东村邗上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3.7.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吴和尚	男	1927.4	芦墟镇甘溪村	1950.1		芦墟区委生产委员	1956.8 在北厍因公牺牲	
张林虎	男	1952.6	芦墟镇尖田村	1970.12	党员	解放军9713部队班长	1974.10.19 在山东文登因公牺牲	
屠永良	男	1953.1	芦墟镇新友村屠家栅	1973.1	1975.8	解放军汽车32团战士	1976.9.9 在安徽大别山区因公牺牲	
陆振帮	男	1927.8	北厍镇南参村	1949.1	1950.12	志愿军0160部队2支队文书	1951.10.15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严留全	男	1934	北厍镇朱家湾村半片港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通讯员	1952.1.17 在朝鲜因战牺牲	
沈根寿	男	1924	北厍镇东浜村	1951.3		志愿军68军605团班长	1952.8.15 在朝鲜因战牺牲	
章全根	男	1930	北厍镇元鹤村蛇垛港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9.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凌文钧	男	1921.3	北厍镇东浜村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9.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凌阿夫
凌世福	男	1931.4	北厍镇东浜村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9.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凌顺卿	男	1933.11	北厍镇西市	1951.6	1952.3 入团	志愿军528部第1器材部战士	1953.1.25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凌顺官
夏兴瑞	男	1931.8	北厍镇西浜村鸭头湾	1950.5		志愿军工兵3团7连战士	1953.7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陈瑞生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肖海荣	男	1945.10	北厍镇北珠村	1965.1	1969.6	解放军4653部队副班长	1969.6.20在山西大同因公牺牲	
钱菊林	男	1951.7	北厍镇川心港村	1970.1	1975.5.21追认党员	解放军1746部队1中队1分队战士	1975.5.21在河北赤城因公牺牲	
朱勤黄	男	1941.8	北厍镇浮楼村圣堂港	1964.9	1966.4	解放军89133部队参谋	1975.6.14受迫害致死	
姚家其	男	1928.2	金家坝乡杨家村	1951.3	1951	志愿军炮兵41团警备连战士	1952.1在朝鲜因战牺牲	
王二观	男	1929.12	金家坝乡九曲港村	1951.3		志愿军41团战士	1952.3在朝鲜因战牺牲	
梅荣生	男	1928.10	金家坝乡梅田村梅牌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9连战士	1952春在朝鲜失去联系	
杨宝金	男	1932.2	金家坝乡油车港村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3营7连战士	1952.9.8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吴菊明	男	1928.3	金家坝乡杨文头村杨坟头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3.7.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顾阿二	男	1924.10	金家坝乡梅田村牌田上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3.7.1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周云生	男	1930.11	金家坝乡双石村转址浜	1951.3		志愿军炮兵41团战士	1953.7.24 在朝鲜因战牺牲	
沈胜林	男	1933.4	金家坝乡油车港村钗金田	1949.3	党员	志愿军77师231团9连班长	1953.11.26 在朝鲜因战牺牲	
梅海芳	男	1956.8	金家坝乡梅田村梅湾	1976.12	1979.7追认党员	解放军3550部队45分队班长	1979.3.3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	
张国兴	男	1920	黎里镇大联村杨康	1951		志愿军27军81师242团1营2连战士	1951.5.2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周阿兴	男	1929.10	黎里镇华字村卯字湾	1949.7		志愿军25军74师220团2连通信员	1953.4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吴留文	男	1940.2	黎里镇新方村朝霞港	1960.8	党员	解放军空字215部队副排长	1970.11.26　在沈阳病故	
包建华	男	1950.1	黎里镇荣锋村王字浜	1972.12		解放军6547部队战士	1973.2.24 在安徽含山因公牺牲	
徐志恒	男	1952.4	黎里镇浒泾街11组	1973.1	1974.7 追认党员	解放军6547部队战士	1973.10 在青浦因公牺牲	
李马根	男	1946.7	黎里镇益丰村虎啸浜	1968.3	1969.11	解放军81277部队排长	1975.7.23 在沈阳病故	
凌金生	男	1954.9	黎里镇欲字村木潭潭	1977.1	1979.7 追认党员	解放军50军148师442团1营2连战士	1979.3.5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	
吴永祥	男	1958.6	黎里镇大联村	1977.1	1979.1	海军航空兵独立1大队飞行员	1984.12 在海南三亚市上空执行战备任务牺牲	
王迪庆	男	1920.1	平望镇南河西街树浜	1948.10		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航空站技术员	1951.1.25 在昆明因公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于阿狗	男	1924.10	平望镇复兴村低字	1949.5		志愿军27军79师235团6连战士	1951.9.1 在朝鲜因战牺牲	
沈桂江	男	1924.10	平望镇端市村东古	1948		志愿军26军76师228团2营战士	1952.2 在朝鲜因战牺牲	
唐林法	男	1956.8	平望镇复兴村陆阳	1975.1	1976.1 入团	解放军 84862 部队战士	1977.10.15 在陕西临潼因公牺牲	
吴芝祥	男	1926	梅堰镇龙北村袁家埭	1947.4		志愿军26军政治部战士	1951.9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 吴只祥
吴阿凤	男	1925	梅堰镇庙头村对浜	1951.4		志愿军20团战士	1952.2 在朝鲜失去联系	
陈云龙	男	1928	梅堰镇庙头村西港	1949			1954 在海南岛病故	
计阿连	男	1927.8	梅堰镇秋泽村金家浜	1953.2	1955.3	8502 部队职工	1960.6.2 在湖南长沙因公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倪阿全	男	1942.10	梅堰镇上练村姚家浜			解放军254部队副班长	1965.12.10　在山东昌邑因公牺牲	
张德兴	男	1921.4	盛泽镇上升村五景	1949.7		解放军31军93师227团战士	1949.10.15　在福建厦门因战牺牲	
陈来有	男	1926	盛泽镇茅塔村	1948.1		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机2连战士	1950.11.9 在朝鲜因战牺牲	
史雷同	男	1932	盛泽镇斜桥街12号	1949.10		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警卫连通信员	1951.4.26 在朝鲜因战牺牲	
朱卫勇	男	1930.6	盛泽镇红木浜35号	1949.11		解放军29军86师258团文化教员	1951.10.4 在无锡因公牺牲	
陈志方	男	1932.6	盛泽镇双林村南昆	1953.1		0970部队华东新训4团4营战士	1953.6 在朝鲜失去联系	
吴金生	男	1934.7	盛泽镇荷花村太平	1955.3		解放军9041部队独立6分队战士	1956.5.1 在福建同安因公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周金观	男	1936.10	盛泽镇斜桥街	1956.2	1955 入团	解放军总参测绘局地形测量队副班长	1958.9.20 在广西大苗山因公牺牲	
张根荣	男	1953.4	盛泽镇大东村徐墱	1975.1	1977.10	解放军 84862 部队班长	1979.12.5 在陕西西安因公牺牲	
程　强	男	1916	盛泽镇南大街潘家弄	1940.9	1942.1	解放军守备 13 师军事法院院长	1967.5 在福建病故	
张海林	男	1963.5	盛泽镇畈桥港村西北圩	1982.1	1983.9 追认党员	解放军陆军 3 师教导队 1 中队班长	1983.9.11 在浙江金华追捕罪犯牺牲	
金水木	男	1925	坛丘乡坛丘村	1949.5	1950.10	志愿军 26 军 77 师 231 团 1 营部副班长	1952.3.23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姚桂荣	男	1930.10	坛丘乡坝里村官查坝	1952.1	1952.3 入团	志愿军 179 师 537 团 8 连战士	1953.7.22 在朝鲜因战牺牲	
计生林	男	1933.6	坛丘乡溪南村溪南浜	1952.3	团员	志愿军 61 军 179 师 537 团战士	1953.7.22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王汉江	男	1916.5	南麻乡桥南村市头浜	1949.5		志愿军炮兵11团炊事员	1952.12.6 在朝鲜因战牺牲	
俞阿大	男	1941	南麻乡桥北村寺西桥	1960.3		解放军9762部队1分队机枪连战士	1960.10.26 在苏州因公牺牲	
许德荣	男	1930	八都乡龙降桥村花园桥	1948.10	1951	志愿军39军115师343团副排长	1952.7.18 在朝鲜因战牺牲	
谢火林	男	1938.12	八都乡长家湾村	1959.3		残废军人	1978.11.23 在吴江病故	
黄　俊	男	1932.8	七都乡双石港村洋南	1949.5	团员	志愿军14团1营3连战士	1951.8.24 在朝鲜因战牺牲	
薄全生	男	1927.8	七都乡李家港村	1949.5	党员	志愿军26军78师233团3营9连战士	1951.9 在朝鲜因战牺牲	
施连宝	男	1932.3	七都乡吴溇村施家浜	1953.1		志愿军179师537团8连战士	1953.7.2 在朝鲜因战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参加革命年月	入党(团)年月	牺牲时所在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地点原因	备　注
孙根林	男	1934.5	七都乡长村陆家港	1955.3		解放军 9127 部队战士	1956.3.21 在福建莆田因公牺牲	
姚大毛	男	1936.7	七都乡行军村	1955.3	1958.9 追认党员	解放军 5430 部队野炮营副班长	1958.8.23 在福建厦门因战牺牲	
沈明宝	男	1944.2	七都乡双荡斗村西仁港	1965.1	1966.2	解放军 4559 部队班长	1966.4.25 在山东因公牺牲	
沈莘田	男	1941.6	七都乡吴 娄村北港滩	1965.5		七机部某工厂技术员	1969.7 在广东牛田洋因公牺牲	
盛阿德	男	1948.6	七都乡双荡斗村南小圩	1971.1	党员	解放军 26 军 76 师 228 团班长	1976.3.8 在山东烟台因公牺牲	
顾兴法	男	1933.9	庙港乡太平桥村毫里	1953.2		志愿军 61 军 542 团 3 营 8 连战士	1953.7 在朝鲜因战牺牲	
朱阿毛	男	1935.12	庙港乡更楼港村	1955.3	团员	解放军福州部队 28 军 83 师 249 团 3 营 9 连班长	1958.12 在福建莆田因公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倪水龙	男	1937.1	庙港乡民字浜村匠人港	1959.3	1960	解放军宁夏军区司令部参谋	1971.8.15 在宁夏银川病故	
邱有洪	男		庙港原大庙区唐湾村	1949.5		志愿军炮兵41团后勤处监护连战士	1952.4.6 在朝鲜因战牺牲	
王金达	男	1911.10	震泽镇周家扇村吴家港	1949.8		解放军福建军区39军117师249团炊事员	1951.7.16 在福建厦门病故	
潘伯明	男	1929.12	震泽镇勤俭村庙富浜	1945.5		志愿军战士	1951.11 在朝鲜因战牺牲	
沈金保	男		震泽镇南横街	1949.4		志愿军35师105团1营3连战士	1952.2.6 在朝鲜因战牺牲	
曹金德	男	1924.2	震泽镇新乐村张善坝	1948.7	1949.9	解放军0080部队1支队2中队7分队班长	1953.4 在浙江一江山岛因战牺牲	曾用名曹观生
周小金	男	1928.11	震泽镇齐心村下马浜	1951.2		解放军驻黑龙江852农场战士	1956.11 在黑龙江宝清因公牺牲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　牲　时　间 地　点　原　因	备　注
孙二云	男	1939.11	震泽镇南横街9组	1962.10		解放军总字215部队2室研究实习员	1968.2.8 在包头因公牺牲	
陈耀庭	男	1932.9	震泽镇南横街	1949.9	1951.3 入团	江西赣南医专教师	1970.3.16 在江西赣州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严明昌	男	1925.10	铜罗镇旺家村罗南	1951.3		志愿军2分部内洞工兵器材部战士	1952.10.19　在朝鲜因战牺牲	
王六一	男	1934.4	铜罗镇人民街银行弄5号	1953.2		解放军铁道兵8503部队4支队1连战士	1955.10 在江西贵溪因公牺牲	
张顺毛	男	1920.11	铜罗镇胡店村倪家里	1947	党员	残废军人	1972.1.21 在吴江病故	
张冠忠	男	1954.10	铜罗镇胜利街南街60号	1978.6		解放军434部队电工班长	1979.11 在沛县因公牺牲	
袁文道	男	1932.10	青云乡雷墩荡村石街上	1950.1		志愿军50军149师445团1营3连战士	1950.9 在朝鲜失去联系	

姓　名	性别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革命 年　月	入党(团) 年　月	牺牲时所在 单位及职务	牺牲时间 地点原因	备　注
顾全生	男	1927	青云乡文头村坟头浜	1951.3		志愿军202师606团机枪连战士	1952在朝鲜失去联系	
杨卫荣	男	1953.1	青云乡文头村坟头浜	1973.1	1972.12入团	解放军6547部队21分队战士	1973.3在安徽含山因公牺牲	
纪荣福	男	1914.1	桃源乡九里桥村计家里	1949		志愿军第9兵团副班长	1951.4.26在朝鲜因战牺牲	曾用名计耀章
周阿同	男	1933	桃源乡原严墓区八善村	1951.6		志愿军工兵3团驾驶员	1952.6.2在朝鲜因战牺牲	
戴金龙	男	1929.12	桃源乡新桥村严士浜	1953.1		志愿军铁道兵团7团3营8连战士	1953.7.3在朝鲜因战牺牲	
颜阿二	男	1927.5	桃源乡永康村鸭来浜	1947.5		志愿军73师218团3连班长	1953.7.8在朝鲜因战牺牲	
吴毓驊	男	1925	浙江瑞安县湖岭区下瑶村	1949.2	1949.2	震泽区开弦弓乡长	1950.9在震泽区郎池村被土匪杀害	

后　记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编辑出版《吴江英烈》。

本书以收集吴江籍的革命烈士为主，对虽非吴江籍人但牺牲在吴江或主要活动在吴江的烈士，也予选入。本辑所收录的21位烈士的序列，以烈士牺牲时间的先后排列。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吴江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孟达同志特为本书封面题字。县委副书记钱明同志特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老同志和有关单位的指导与帮助，为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写时间较短，又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难免有漏讹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1年10月

(苏)新登字第 002 号

吴江英烈

中共吴江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吴江县民政局 编

出版发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印　　刷: 江苏吴江震泽印刷厂

开本 787×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4,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ISBN 7–5345–1300–6

Z• 197　　定价: 2.50 元

责任编辑　蔡克难

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